

写 在 前 面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深入发展，浦江两岸巨大的建筑物犹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新盖的现代化工厂鳞次栉比；高耸入云的烟囱，直刺云天；大片大片的工人住宅群，在浓密的绿荫掩映下，显得格外朴素美观；巍然挺立的彩色电视塔，以它居高临下的雄姿，鸟瞰全市；金碧辉煌的上海体育馆，它的圆形屋顶又宛似一朵硕大无比的葵花，向阳怒放……。上海，这块在旧中国被称为“帝国主义冒险家的乐园”和“十里洋场”的地方，今天，它是多么欣欣向荣，英姿焕发。面对这些日新月异的巨大建筑，我们不能不感谢广大建筑工人忘我的辛勤劳动。

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添砖加瓦，大干快上，这是广大建筑工人的共同心愿，也是他们的光荣和骄傲。可是，在那暗无天日的旧社会，建筑工人造起高楼千百幢，遭受的苦难却如滚滚的浦江水，说不完，诉不尽。当年，在上海建筑工人中，曾经广泛流传着这样的歌谣：

人进工地，
牛进磨房；
有活干，累断筋骨，
无活干，饿穿肚肠。

生命安全无保障，
断手折脚事平常；
老板工头腰包满，
我侬无钱养儿娘。

造起高楼千百幢，
好比大山压身上；
住在“鸽笼”等天亮呀，
总有一天要解放！

这些歌谣，是广大建筑工人对万恶的旧社会的强烈控诉；同时，也反映了广大建筑工人决心从斗争中求解放的坚定信心。

在旧社会，建筑工人大多来自破产农民。他们刚从封建地主阶级残酷剥削的狼牙下挣脱出来，一进城市，又落入了建筑行业资产阶级敲骨吸髓的虎口。

在旧社会，建筑工人不仅丝毫没有政治地位，劳动条件也极其恶劣。每天在资本家的皮鞭下，他们从事奴隶般的劳动，伤亡事故不断发生。看看旧上海的高楼大厦，哪一座不是在建筑工人的白骨堆上垒筑起来的；哪一座不都是凝聚着建筑工人的斑斑血泪。

“一唱雄鸡天下白”，浦江两岸尽朝晖。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了。广大建筑工人也和全国广大劳动人民一样，翻身作了国家的主人。二十多年来，他们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以阶级斗争为纲，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他们不辞辛劳，夜以继日，到处盖厂房、建大厦，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

出了巨大的贡献。

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老工人的回忆对比，这是老一辈建筑工人不断提高阶级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坚持继续革命、永葆革命青春的动力；同时，也是对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青年工人进行阶级教育和路线教育的最好教材。为此，我们特从许多老一辈建筑工人回忆对比材料中，选择了其中的一部分，汇编整理成这样一本小册子。它从各个不同的侧面，不仅反映了建筑工人在旧社会的深重苦难和反抗斗争精神；而且充分体现了广大建筑工人在新旧社会政治地位上的根本变化，反映了他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精神面貌，表达了他们坚持马列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继续同刘少奇、林彪这些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决心。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我们得到了有关单位的大力协助，谨致谢意。

编 者

一九七六年四月

目 录

悲欢浇灌混凝土

- 上海市第六建筑工程公司退休工人章利明讲家史 1

幢幢“洋楼”有血泪

- 上海市华东建筑机械厂退休工人徐华清的家史11

抚今追昔话手艺

- 上海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工人郭金龙的回忆对比27

两代木工的恩和仇

- 上海市门窗加工公司工人徐其根的家史.....37

团结斗争求解放

- 上海市第八建筑工程公司工人胡成德的家史46

满腔怒火压不住

- 上海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张雪江的家史.....64

油漆工人绘新图

- 上海市第七建筑工程公司工人童传根的家史80

工人登攀新高峰

- 上海市机械施工公司工人汤士杰的家史93

悲欢浇灌混凝土

——上海市第六建筑工程公司退休工人章利明讲家史

谋 生

我老家在苏北靖江，祖祖辈辈没有一分地。一家七口人的生活，全靠父亲做药工的一点薄薪来维持。妈妈为着减轻爸爸的负担，起早摸黑地帮人家缝洗衣服。父母亲即使日夜辛勤劳动，还是维持不了一家人的生活。十二岁的哥哥只得出去学生意。

我十五岁那年，父亲不幸生了重病，连续多日高烧不退，整天卧床不起。家里连锅盖都揭不开，哪有钱替父亲买药呢？可怜我父亲做了几十年药工，到头来自己生了病却买不起一帖药！一家人只得眼睁睁地看着父亲含恨死去。

爸爸死后，妈妈更苦了。一家生活的重担全压在她的肩上。妈妈整日整夜地洗啊，缝啊，也不顶用，只得把两个妹妹卖了。一年秋天，我也被迫到附近一个地主家去当小长工。这个狗地主，说起来还是我家的一个什么远房表叔。然而，只有阶级亲，哪有超阶级的爱？我一到他家，就成了小奴隶。每天一清早出去放牛割草，然后还得到地里去拔棉花秸、打谷子。我的手心被磨破了皮，出了血，痛得钻心。可是，狗地主还骂

我装死、偷懒。到了寒冬，凛冽的北风吹得我直抖。手上的伤口变成了一道道很深的裂缝，手肿得象个大馒头。有一天，我的手实在太痛了，没去干活。狗地主就举着棍子，气势汹汹地向我扑来。我仇恨满胸，就急忙躲过棍子，拔腿朝家里跑。第二天，狠心的地主又追到我家，逼我马上回去干活，否则就要付给他六个月的饭钱。

给地主干了六个月，还得付饭钱？天下哪有这种道理！这就是旧社会的霸道。妈妈伤心地哭了整整一夜，怎么办呢？听人家说上海很大，有工作做，妈妈只得狠下心，托了前村的一个熟人，把我带到上海去学生意。临行时，双目失明的奶奶抖抖嗦嗦地摸到我跟前，紧紧地拉住我，哽咽着说：“利明，奶奶身边只有你这条命根子。要不是地主逼的，说什么奶奶也不能让你离开啊！……”

就这样，我和那个同乡人乘上船，一路上昏昏沉沉的，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船靠岸了。上码头时，我和那个同乡人被人群挤散了，我东找西寻，连嗓子也叫哑了，还是没见他的人影。这时我孤身一人，人地生疏，举目无亲。上海纵然有千百条马路，可我该走哪条道呢？

我沿着码头来回地走着。天黑了，我来到一座桥边，刚站下，突然有一只手搭上我的肩膀：“小阿弟，依站在这里做啥？”一个不认识的瘦子皮笑肉不笑地咧着满口金牙的嘴，喷出一股烟酒臭问我。

“要做生活。”我回答了一句。

“依想做生活，好啊！我介绍依去。”听说他可以介绍我做生活，我便跟他穿过马路，来到一个粥摊上。他给我喝了碗粥，领我到一個客栈里睡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他把我带到海宁路

的一家茶叶作坊里。他跟一个胖家伙嘀咕了一阵。当那胖家伙塞给他二元银洋之后，他就洋洋得意地走了。事后我才知道，原来那瘦子是个贩卖人口的骗子，他是把我骗到这里，卖给了这个茶叶作坊老板。

小 工

旧社会劳动人民的生活实在难熬，真是度日如年。我十九岁那年，被老板一脚踢开。我在茶叶店整整干了三年，到头来除了两手老茧外，连一床铺盖也没有。我从茶叶店出来，一时找不到工作，又只得流浪街头。有一次听说“朝贵记”营造厂招收小工，每天有十二个铜板可拿，我想有工作总比流浪街头强些，于是我就到了“朝贵记”招工处。

在一间破旧的板房里，已有八九个同我岁数差不多的人等在那里，他们都是和我一样无家可归，才来到这里的。因为我们这些人从来没有干过建筑业的小工活，老板就叫一个姓李的师傅带领我们。李师傅满口山东话。我们都叫他“老山东”。老山东中等的个子，结实的身板。听说他和我们一样，十多岁从山东逃荒到上海，在“朝贵记”干了十多年，是个出色的混凝土工。可是，三十多岁了还没有成家，除了随身一床铺盖外，再也没有别的东西。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跟老山东一起到当时正在兴建的永安公司工地干活。

这是一九一八年的冬天，大楼工程已经进入到第六层。

老板要我们这些小工把混凝土一筐一筐地从地面扛到六层楼，浇灌混凝土柱子。我抬头一望，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

只有二十公分左右宽的两块跳板，一层一层地盘向高空，四周无遮无拦，一不小心，随时都有从高空摔下来的危险。

我们抬着满筐的混凝土，踏着又窄又陡的跳板往上抬，每走一步，脚下的跳板被压得剧烈地抖动着。跳板越盘越高，我的心也越收越紧。低头看，脚下许多只箩筐在尾随而上；抬头望，陡窄的跳板盘个没完。我突然脚下一滑，身子一个摇晃，幸好被背后一只有力的手抓住了。我回头见是老山东扛着箩筐跟在后面，就感激地向他说了声谢谢。他亲切地说：“小兄弟，不用谢。你不要看上看下，把脚步踏稳了再挪动。”我照着老山东教我的法子，又挣扎着爬上去。

扛啊，装啊！一直干到晚上也没歇一下。老板在旁边用凶狠的眼睛盯着我们，谁的箩筐装得浅了些，他就呼吆喝六的，一定要重新装过。一方，二方，……十方……二十方。老板眼看着混凝土快要挑完了，心里盘算着今天又可以到手多少银洋。而我们穷工人们，一天整整干了十二个小时，又累又饿，这是他从来也不放在心上的。

好不容易熬到晚上，我们却只拿到十二个铜板的工钱。但就在这十二个铜板中，还得交给老板四个，算是“过手钿”和住宿费。剩下的八个铜板，当时只能买八只大饼。然而，为了生活，我们只得每天来到这里卖命。

整整一个春天过去了，我们挑完了永安公司工地上的混凝土，又到闸北的一家工厂去挖土。那时正是夏天，火辣辣的太阳晒得大地象个火坑。我们这些穷小工从早到晚做十四个钟头。光着脊背，穿着短裤，顶着烈日挖土装运。头上太阳晒，脚下热气逼，汗水滴了又干，干了又淌，裤子上留下了条条斑白的盐花，身上脱了几层皮。有一天中午，我正在挖一条沟，挖

到了一根瓦斯管子，顿时一股臭气直冲鼻孔，胸口就象堵上了烂棉花，透不过气来，我两眼一黑就倒在地下。也不知过了多久，只觉得耳边声音嘈杂，睁开眼睛，才知道自己正躺在老山东的怀里，旁边还围着不少工友。我挣扎着想站起来，但一阵天旋地转，又倒了下去。工友们见了都很着急，找到了正在凉棚底下乘凉的老板，要他给点钱送我去医院。不料他把扇子一摇说：“哼，穷瘪三还想看病？告诉侬，今朝的土勿挖好，勿要想吃饭！”当工友们还想跟他评理时，可他早摇晃着扇子走了。当时大家都气愤极了。这时，只见老山东一声不响地把一件短褂子脱了下来，塞到一个工友手里，催他快去典当。一件短褂，当了四角钱，给我看了一次病。我服了药，身体逐渐好了起来。打那以后，我渐渐地明白了，无论是茶叶作坊老板，还是营造厂老板，天下的老板都是一个样，他们对待工人都是那么狠毒，他们的心都是黑透黑透的。而咱们穷工人，才是心贴心。

严冬伴随着呼呼的北风来到了上海。我们借住的阁楼象凉亭似的，四面透风。那时做一件小布衫裤，就得花我整整一个月的工钱，又哪来的钱买棉被呢？晚上，我只得拿些稻草往身上盖盖。西北风一阵紧似一阵，身子也越缩越紧。有一晚，朦胧中觉得身上似乎暖和了一些，睁开眼一看，又是老山东把他的铺位移到了我的身旁。他那条打满补钉的被子一半盖在我的身上。这时，一股暖流直涌上我的心头。这阶级的情谊，使我激动万分。我紧紧地抱着老山东，眼泪再也控制不住了。老山东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低声地说：“睡吧！明天还要干活……。”从那晚起，整整五六个冬天，都是靠老山东这条棉被温暖着我俩的心……

有一年冬天，天气特别冷。我只穿着一件破夹袄。一天清早，外面结着厚厚的冰，那时，我们在交通大学工地上干活。走到工地一看，脚手架上都结着一层厚厚的霜，爬上去很危险，我们几个工友商量了一下，大家说别干了，等霜化了后再说。我们刚坐下，老板头戴呢帽，身穿长呢大衣走了过来。他一见我们没干活，气得大发雷霆。我们说这种天气不能干活。他把两只手往大衣口袋里一插，脖子往衣领里缩了缩，鼻子连哼了两声说：“冷？我怎么一点不冷！快干活！”没有法子，我们顶着呼呼的西北风，憋着一肚子气，爬上了高高的脚手架。我们正干着，猛然听到一声惨叫，回头一看，不好，一位工友从三层楼高的脚手架上跌了下去。我们急忙走下去。那位工友已摔得不省人事了，鲜血溅了一地。那位工友就这样悲惨地死去了。

对死难工友的悼念，对老板的仇恨，凝成了一股愤怒的烈火在我们胸中燃烧。我们坚决不干了。回到住处时，老板正在屋里烤火喝酒。见我们离开工地回来，他瞪着布满血丝的眼睛说：“今天不做，明天不做，叫你们去喝西北风！”我们气极了，就商量着和老板斗争的办法，大家议论纷纷：

“陈老板吃得好，穿得好，最近又开了分店，这还不是从我们身上刮来的！”

“陈老板自从拜了巡捕房的包打听做老头子后，更越发仗势欺人了。”商量结果，许多工友都决定不干了，让老板喝西北风去，让他也知道咱们小工厉害。

过了几天，老板发觉人走了一大半，而且多数都是上手师傅，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那天我正在另一个工地干活，老板找来了，低头哈腰地又是打招呼，又是赔礼，问我其他

人在哪里。我说：“不知道！”他只得灰溜溜地走了。

遭 遇

抗日战争爆发后，市场上物价飞涨，我们每天做的工钱连半斤美饼都买不到。那时候，造房子的活也少，我只得到处打短工。码头上卸煤，扛大包，挑菜，割草，什么样的活都干，还常常是饿着肚子。在这八年里，我们这些穷小工，遭受老板、日本鬼子的双重压迫，尝尽了诉说不完的苦难和辛酸。好不容易熬过了这八个年头，当时我想日本鬼子投降了，咱们总该松口气了吧！万万没想到，虎去狼来，国民党反动派“劫收”了上海，我们穷小工的希望又破灭了。

一九四八年的冬天，寒潮侵袭着上海。一夜过来，有多少穷人冻死在路旁！

一天半夜，我们几个穷小工顶着呼呼的西北风，摸黑从南市步行到闸北去上工，路过永安公司时，我触景生情，不禁想起当初同老山东在这里浇灌混凝土的情景。前几天听说老板嫌老山东年老不中用了，把他赶出了门。不知他现在在哪里安身？……我正想着心事，忽然听到走在前面的一个工友惊叫了一声：“利明快来！老山东……”我赶快抢上前去一看，愣住了。在昏暗的霓虹灯光下，老山东还是穿着那件破棉袄，骨瘦如柴的身子蜷缩在水门汀地上，一动不动。我扑到他身上，大声地叫喊着：老山东，老山东！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我是利明呀！可是，老山东再也不会讲话了！

西北风凄厉地呼啸着，它仿佛要撕碎那黑沉沉的天。永安公司大楼，你为什么不说话？！老山东为这幢大楼挖过基础

土,浇过混凝土,他为资本家造过多少高楼大厦,可到头来,竟连个栖身的地方都没有,反而惨死在自己浇灌的混凝土柱子边……面对着这吃人的旧社会,我和工友们都气愤极了,紧握拳头,恨不得把这个旧世界砸个粉碎。

新 生

平地一声春雷响,
亿万人民得解放;
东方升起红太阳,
拨开迷雾见曙光。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毛主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上海。工友们兴奋极了,大家扔下了手里的活,拥挤着跑到马路上迎接亲人。从那一天起,我们穷小工终于摆脱了穷困、悲惨的命运,当家作了主人。

一九五一年,党组织委托我带领一批混凝土工到新疆乌鲁木齐去建造一家毛纺织厂,我高兴地接受了这一任务。四月里的一天,领导同志亲自送我们上了火车,并对我说:“老章啊,现在咱们都是国家的主人了,这是翻身后的第一仗,一定要打得漂亮!”我向领导表示了决心。领导同志把一朵朵大红花挂在我们的胸前。在一片欢腾的锣鼓声中,列车离开了上海。到了目的地后,大家加倍努力地工作着。经过六个月的奋战,毛纺厂建成了。那年年底,我回到了上海。解放后,我不仅在政治上翻了身,而且在组织和同志们的关怀下,五十一岁那年,我结了婚,成了家。新房被布置得整整齐齐。看着

这一切，我整整几个晚上睡不着觉。这时，我又想起了老山东，想起与老山东合盖一条棉被的年月，想起老山东劝我成家的事，更想起了老山东那悲惨的命运。现在，有毛主席的领导，我们是多么幸福啊！在旧社会，剥削阶级把我们穷小工看作一棵草；而如今，毛主席、共产党却把我们工人当成宝。我虽然五十多岁了，但是翻身的自豪，常常激励着我，总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用不完的力，我要一辈子努力工作报答毛主席的恩情！

一九五五年，上海展览馆开始建造。我们混凝土工打了头阵，攻下了土方关，又展开了大面积浇灌混凝土基础的战斗。工地上可热闹了，搅拌机声轰鸣，小车来往飞奔，解放军同志也来支援我们。连续几天几夜地干也不觉得吃力。领导把我拉到工棚里，要我休息，可我怎么能够得下呢？这是为咱们工人阶级、为咱们新中国造房子盖大楼啊！我乘领导同志不备，又回到了工地上。那时，我们小组是工地上的突击队，哪里最紧张，我就带领全组同志奔向那里。听说化石灰工作赶不上，我们马上过去支援。化石灰是比较脏比较累的，同志们却不顾这些，还是起劲地抢着做。为了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要快马加鞭地干。

上海展览馆的混凝土浇灌任务胜利地完成了，我们得到了领导的表扬。但是我们决不满足已经取得的成绩，决心再接再厉，又打起背包奔赴洛阳，为我国建造第一座最大的拖拉机厂。

在洛阳的工作更使我难忘。冬天天冷，露天不能干活，组织上专门派来了老师，教我们学文化。解放前五十多年，我尝尽了不识字的苦楚，现在五十多岁了，想不到还有学文化的机

会。我用心学习文化，一个字，一句话我都不轻易放过，不停地写啊，背啊，在一年的时间里，我就摘掉了文盲帽子。我非常高兴，就用自己识的字，按照三十多年前的旧址给老家去了一封信，打听家里的消息。几天后，我收到了家乡的来信，拆开一看却是：“此屋二十多年前被炸，人去何处不详。”得到这个消息，我并没有流泪，把对旧社会的仇恨，化为努力学习、积极工作的力量。

洛阳拖拉机厂的工程任务也很紧张，我们发扬了在上海展览馆工地工作的冲天干劲，出色地完成了厂房及一切工业设施的混凝土工作。一九五七年，我们回到上海，又投入了建造闵行锅炉厂工程的战斗……

看着社会主义祖国蒸蒸日上的建设事业，我打心眼里感到高兴。解放后没几年，我就连续参加了许多大工程的建造工作。虽然我年纪大了，但是工作需要我到什么地方，我总是二话不说，打起背包就走。我们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尖兵，祖国大地天南海北，哪一处没有我们的足迹！

一九六一年，在领导的再三动员下，我光荣地退休了。那天，同志们敲锣打鼓地把我送到家里，老伴喜得合不拢嘴，女儿也兴高采烈看着这一切，我的心又不平静了。退休后该怎样度过自己的晚年呢？我决不能光顾着抱抱孩子、生炉子、拎拎篮子、下下棋子，而是要继续为党工作。十几个年头过去了，我没有忘记战斗，我用自己的苦难家史教育学校里的孩子，教育他们不要忘记过去老一辈的苦难，积极地参加了里弄里、社会上的各项工作。

上海市第六建筑工程公司工会写作组整理

幢幢“洋楼”有血泪

——上海市华东建筑机械厂退休工人徐华清的家史

一天下午，为了帮助闵行一家兄弟厂解决起重难题，领导上要找几位工人一起去支援。退休已有五、六年的徐华清师傅一听到这个消息，就积极报名参加。在共同的战斗中，看着年过七旬、满头银丝的老徐师傅干起活来还象小伙子一样有劲，大家打心眼里敬佩。

工作结束后，兄弟厂领导同志拉着老徐的手表示感谢，老徐爽朗地说：“谢什么！我们工人在旧社会被迫为资本家卖命，有了技术也不想拿出来；现在我们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主人，干什么都是为了革命，革命不分你、我、他。为社会主义建设出力，这是我们工人阶级的本份哪！”

完成任务后，厂领导派工人小张送徐师傅回家。汽车经过外滩，老徐两眼紧盯着往后退去的高楼大厦，深有感触地说：“解放前，我们工人真正是卖命哪！造那幢海关大楼时，我就差点摔死。解放前造的这些高楼，哪一幢不是沾满着我们中国工人的鲜血！”

老徐师傅曾参加过海关大楼、和平饭店、上海大厦等五、六幢高楼的建筑工程。这使小张感到惊奇。一到他家，小张来不及坐下就问：“徐师傅，造大楼是建筑行业的事，你怎么会

去的？”

“唉！在旧社会，我哪一行没干过？那时资本家知道我是船工出身，有一套攀高登上的本领，造高楼大厦可以派用场，就骗我去替他们卖命。”

建“海关”陷进豺狼口

徐华清出生在扬州一个三代船工的家庭。十四岁那年，贫困的家境，迫使父亲把他送到一条大船上去做小船工。不管是寒风刺骨的隆冬，还是炎阳酷暑的盛夏，徐华清一年到头没有休息的权利，他没日没夜地被船主当奴隶使唤；背纤、撑篙、爬桅杆、洗刷、烧煮……。这风口浪尖上的船工生涯，使徐华清磨炼得机敏灵巧，胆大心细，善于在颠簸的航船上，爬上桅杆高空操作。

徐华清十八岁那年，因忍受不了船主的压榨，只好和母亲以及九岁的小妹，跟着舅舅到上海谋生。但是，“十里洋场”是冒险家的乐园，哪有穷人的生路？小妹进了日华纱厂当包身工，母亲替人家缝补浆洗，徐华清跟着舅舅进英联船厂（今上海船厂前身）做小工。就这样，一家人拚死累活，才勉强糊口。有一天，他和九个穷兄弟一起扛四千多斤重的大铁板时，因为重量太大，压断了一根杠棒，而工头蛮不讲理地逼着要他们赔。徐华清和九个穷兄弟满腔愤恨，一哄而散，把大铁板卡在交通要道上，使工头急得直跺脚。徐华清气愤地离开英联船厂后，开始过着东干一天西做一日的“野鸡工”生活。

就在这一年（一九二五年），英、美、法帝国主义为了把海关变成侵略中国的据点，肆无忌惮地对中国人民进行敲骨吸

髓的压榨和掠夺，需要在上海外滩建一幢现代化的“海关”大楼。

新造的海关大楼是钢骨结构的。它的施工要求很高，要在桩基础上面先用工字钢立起骨架，然后再用钢筋混凝土、花岗岩砌块以及砖头等筑成外形。在旧社会，资本家是根本不讲安全生产的，因此，工人们要在没有安全保险设施的条件下，攀上那几十丈高的高空把工字钢搭起骨架子。要完成这种高空作业，老板就得雇佣具有攀高技术工人。所以，承包这幢大楼钢骨架安装的王老板，就到处挑选善于攀高爬上的工人，为他卖命。他通过二包徐老板的同乡关系，找到了徐华清。就这样，徐华清也被送进了建造“海关”大楼的豺狼之口。

徐华清和穷兄弟们来到外滩海关大楼工地，一连几天顶着严寒，清理现场，做吊装的准备工作。

一天清晨，乌云翻滚。海关大楼门首四根石柱的工字钢骨架就在这天起吊安装。王老板和徐老板很早就赶来监督开工。

两丈三尺高的钢骨才放稳，徐老板就把正在忙碌的徐华清叫出来，要他爬上那光溜溜的工字钢上去脱卸夹。

“长竹梯呢？”徐华清问徐老板。

“你爬桅杆也要长竹梯吗？”徐老板恶狠狠地说。其实，这就是王老板要雇佣船工做吊装的诀窍之一。他隔夜就关照徐老板：用梯子费事，做不出生活，让工人直接爬上去。

雪后，天特别冷。工字钢上还覆盖着一层薄冰。徐华清抓住钢柱，只觉得寒气自双手传遍全身，冰凉的钢柱象要揭去他的手掌皮。那呼呼的北风直往袖口、裤腿里钻。不一会，他的手脚就被冻麻木了。徐华清每登上一步都要费很大的劲，

有时双手抓不牢，一滑就溜下一大截。他越往上攀，钢柱被风摇曳得越厉害。底下的穷兄弟看着在晃动不定的钢柱顶端的徐华清，个个都替他捏了一把汗。

到第二年冬天，大楼已安装到第八层——海关钟楼了。这纵横迭接的钢骨架，凝聚了中国工人多少仇和恨啊！一天傍晚，劳累了一天已经疲惫不堪的徐华清，正在收拾工具准备下班。王老板手下的监工却还要徐华清立即爬上钟楼去缚钢丝绳。

“马上要下工，来不及。”徐华清没好气地顶撞说。

“王老板关照钢丝绳今天一定要缚好，明天一大早就开始校正，误了工期你担当得起？”监工狐假虎威地说。

徐老板听到争吵，赶快过来逼着徐华清爬上去。

精疲力尽的徐华清强忍住一肚子气，把一根长麻绳缠在腰里，踏着工字钢上的铆钉，象爬桅杆那样，向钟楼的横梁攀去。徐华清坐在五吋宽的工字钢横梁上，用力搓揉着冻麻木的双手，双脚勾紧钢柱，解下腰里的麻绳，把一端放下去将卸夹钢丝绳吊上来。这时的徐华清，肚皮早已饿得贴住背脊，哪里还有力气拉？他咬着牙一把一把地收着麻绳，收一把停一下喘口气再收，好不容易才把钢丝绳拉了上来。不料在解麻绳的时候，由于徐华清手指已冻僵，加上天色渐暗，看不清楚，结头突然从手里滑脱出去，一时来不及伸手抓住，卸夹钢丝绳就拖着麻绳直往下落。徐华清虽然赶忙弯下腰去想把它抓住，但酸软的四肢再也无力制止越落越快的绳索。相反，一个措手不及，把他自己也拖了下去。就在这一瞬间，徐华清急中生智，双脚顺势在钢柱上用力一蹬，朝着对面的柱子腾空跃去，伸开双臂死死地抱住了它。工人兄弟赶忙把他救下来。徐华清的

衣服已被磨破，臂膀也已被擦得鲜血直淌。

可是，那狠毒的老板和外国监工，对此却毫不在意，只顾在地面上寻找从高空中落下来的卸夹和绳子。徐华清目睹资本家视工人生命不如根绳子，不禁怒火万丈，“呸！”地一声，向老板的背影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沫。

第二天，徐华清来到工地找到徐老板气愤地说：“你们对工人的性命，看得连一个卸夹都不值，我不干了！”

站在一旁的王老板气得脸上的横肉直抖，可当他想到工程正在节骨眼上，走了这个高空作业的技术工人可是一个损失。于是他皮笑肉不笑地说：“有话好讲，离竣工只有两个月了，你现在中途退场可不行。”

“我刚来时你说只干一年，我已经干了一年三个月了，不能算‘中途退场’。”徐华清毫不退让。

“哼，要走也容易。”王老板阴险地说，“你穿了一年多的卫生衫裤，连本加利还清了才能走。”

这时，徐华清才明白了王老板“额外照顾”的全部恶毒用意。原来，在徐华清上工的第一天，王老板给四个攀高工人每人一套卫生衫裤，并假惺惺地说这是“额外照顾”。可是现在这套卫生衫裤，竟成了资本家榨取工人血汗的紧箍、压迫工人的锁链；把工人紧紧地锁在资本家的身边，为他卖命，任他宰割。

就这样，徐华清把结算的一个月工钱，统统摔在王老板的写字台上，迈开大步走出办公室，离开了海关大楼工地。

白骨垒成“沙逊”大楼

旧社会，“十里洋场”的高楼大厦，哪一幢不是在劳动人民

的白骨堆上建造起来的？单说南京路外滩的沙逊大厦（现在的和平饭店），当年建造过程中就有几十条人命被葬送掉。

徐华清含恨离开海关大楼工地后，由于生活所逼，不久，他又来到沙逊大厦工地，给另一个包工头干活。

沙逊大厦工程是一九二六年破土动工的。这是帝国主义分子、冒险家沙逊，在从事房地产投机中向高层建筑方面扩展业务的第一步。因此，沙逊非常重视施工情况，派了许多“洋鬼子”来监工。

那是一九二七年的黄霉季节，阴雨连绵，雷雨交加。包工头为了讨好外国监工，逼着工人日夜做工。大楼铁骨架已搭到六层，“抢快”（解放前，起重工打桩工的总称）们正在冒雨扛运工字钢。近一吨重的工字钢，把徐华清等六个工人压得透不过气来。被旧社会折磨得面黄饥瘦的“抢快”小工杨小柱子，跨一步就要喘一喘。他一步不如一步稳，摇摇晃晃，一手碰着了一根破旧的电缆，一搭手，就倒在地上。“触电！”一个可怕的念头闪进徐华清脑际，他不顾一切地奔向总开关，拉下闸刀，回头又赶忙招呼穷兄弟抢救杨小柱子。

大家七手八脚地把他抬到通风处，赶紧给他做人工呼吸，杨小柱子终于缓过一口气来，睁开了眼睛。这时正好包工头陪着外国监工踱过来，那外国流氓看到工人们围在一起，就操着生硬的中国话吆喝起来：“磨洋工不行，快干活！”

“你们不睁开眼睛看看，人都触电了！”徐华清愤怒地顶撞着，指着那根破旧的电缆说，“这根电缆破得不能再用了，得马上换新的！不换，下次还要出事故。”

“哼，你倒说得轻巧。不关你的事，快干活！”包工头若无其事地和外国监工走开了。

杨小柱子虽已得救，但虚弱的身体经电流一烧，更加支撑不住，倒在床上好几天爬不起来。杨小柱子一倒下，包工头不仅不予治疗，反而把几天的工资全部扣掉。过了几天，杨小柱子没有办法，只得挣扎着仍去上工。

起初两天，工人们照顾着杨小柱子，不让他攀高，在地面做些辅助性的活。一天，包工头看到杨小柱子在扫地，阴阳怪气地说：“你怎么不上去？”一个工人解释说，杨小柱子触电以后身体还没复原，上不得高空。可包工头蛮横地说：“不行，干‘抢快’就得上高空，你要干就上去，不干就走路。”逼着杨小柱子爬上了脚手架。杨小柱子身体虚弱，站立不稳，脚下一滑，便从三层楼脚手架上摔下来。

徐华清正在六层楼上干活，突然听到从地面上传来嘈杂的人声：

“杨小柱子跌死罗！”

“杨小柱子脑浆都跌出来啦！”

徐华清和几个工友马上从六楼赶下去，只见杨小柱子躺在地上，脑浆四溅，早已断了气。

“要老板负责处理后事！”“找老板算账！”工人们都已从脚手架上下来，围在杨小柱子尸体旁边愤怒地议论着。包工头和外国监工见众怒难犯，吓得夹着尾巴溜了。

工人们不肯散去，营造厂老板不得不派了个代表来处理身后事。在工人们的一致要求下，资本家被迫拿出几元钱来作丧葬费。

杨小柱子死后，有一天下午，风狂雨猛，电闪雷鸣。工人们只得停工。包工头为了讨好洋监工和资本家，叫“抢快”小工配合石匠开夜工，补回半天的工期。

这天晚上，雨仍然在下着，偶尔还传来几声闷雷。二楼平台上灯光昏暗，几十个石匠在凿着花岗岩砌砖，“抢快”小工们在扛着几百斤重的石块。包工头和外国监工看到工地上坑坑洼洼积满了水，就一个个钻进写字间去喝酒作乐了。大约十点钟左右，徐华清正好扛完一块石头往下走，突然电灯熄灭了。写字间的一个包工头吆喝着：“哪个穷小子拉下了电门？不要命啦！”

“刚才二楼闪了一阵电，线路烧坏啦！”一个粗壮的嗓门回答。

徐华清一听线路出事，马上想起杨小柱子触电的事，便不顾一切地从脚手架上爬下来，招呼几个工友一起直奔配电间，拉下了所有的闸刀，找了些竹片做成火把，举着冲上二楼。

冲在前头的徐华清刚踏进二楼平台，只见一片惨象，五六十个石匠、“抢快”小工躺满一地。有的蜷曲，有的仰卧，有的扑在石块上，有的压在石头下，有的捏紧钢凿铁锤，有的抓牢杠棒绳索，一个个都已昏死过去。

经过徐华清他们进行抢救，有些人虽然缓过了气，但仍有四十位阶级兄弟被夺去了生命。

“找老板算帐去！”徐华清怀着满腔悲愤，一手举着火把，一手挥动被烧坏的电缆，领着大伙冲向写字间。

工地怒吼了，住在附近的泥木工也闻声赶来，把写字间围得水泄不通。那些大小包工头和外国监工吓得屁滚尿流，浑身打颤，慌忙打电话向反动政府和他们的洋老板求救。这些家伙在电话里嘀嘀咕咕，经过一阵阴谋策划后，一个包工头鬼鬼祟祟走出写字间对工人们说：“工部局对此事十分重视，来电话要我保护现场，善后处理明天再议。现在已经半夜，诸位先

回去睡觉吧！”不一会，又来了一队英国巡捕，他们借口保护现场，硬是把人们赶走了。

第二天一早，工人们和在沪的死者家属纷纷赶到现场。一看，那些被害人的尸体已经不见了。原来，那些狼心狗肺的资本家和吃人不吐骨头的帝国主义分子耍阴谋，他们昨晚串通一气，就是为了毁尸灭迹！当工人们听到尸体已被运走的消息，肺都气炸了，纷纷冲进了写字间。突然一队巡捕护着营造厂老板和工部局的洋奴向写字间走来。工部局的洋奴说什么“雷雨天触电是平常事。他们前世有罪孽，今朝才遭灾。你们瞎起劲有啥好处？”

营造厂老板狡猾地说：“我也不是一毛不拔的人，一个死人，十元丧葬费。”

工人们听了工部局洋奴和资本家的这番胡诌，怒不可遏，纷纷指责道：“难道一个工人的性命只值十元钱！”“上次触电死了杨小柱子你们为什么不换电缆？结果出了这个大惨案，你们简直不把我们工人当人看啊！”“不能就此了结，我们做工的要有安全保障！”……

营造厂老板膛目结舌，不知所措。工部局的洋奴便赶忙指挥巡捕进行镇压。但工人们不畏强暴，坚持斗争，迫使资本家不得不答应了工人们提出的要求。

造“百老汇”积愤迸发

“百老汇”是现今上海大厦的旧称。英帝国主义为了扩大对我国的侵略，于一九二九年开始经营这个据点，一九三三年建成百老汇大楼。

一九三二年的一天，徐老板的娘，突然来到曹家渡寻找徐华清母亲，大攀什么“老乡”关系。说是徐老板承包了百老汇大楼的钢骨架工程，要徐华清去干活，问徐华清愿不愿去？她过几天再来听回音。徐华清知道后，几年来一直压在心底的愤恨又被勾引了起来。

且不说干那卖命活，老板不把工人当人看待，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单拿姓徐的那阴险毒辣的剥削手段来说，徐华清就有一肚子怒火。刚造海关大楼时，老板欺侮徐华清是“生手”，每天只给一半工钱。即使是这点卖命钱，姓徐的还要寻找法子克扣搜刮。他规定若因下雨落雪而停工，上午十点钟左右停工便全天不算工钱；下午三点前停工只以半天工钱计算。停工与否全由他来决定。临到发工资时，老板还要耍花招，或用拖欠等手段，在工人身上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更可恶的是借故不发工钱……。

想起这些往事，徐华清顿时就有一股气。他对母亲说：“他徐老板是一贯剥削工人的老板，我们是穷工人，他造他的‘百老汇’，我做我的穷小工，跟他这种人根本没有什么乡亲好攀。这个家伙还欠我两个月的工钱呢！他再来，你就干脆告诉他：徐华清不干那卖命的活，叫他把赖掉的两个月工钱快点还来。”

徐老板碰了一鼻子灰。他想，徐华清技术好，在“抢快”小工里有威望，他不来，我一个好手都可能拉不到。老板打定主意一定要把徐华清弄到手。

没过几天，徐老板打听到徐华清在法商汽车公司里擦车子。于是他眉头一皱，忙准备了一份厚礼，去拜见他的流氓“老头子”。

徐华清在法商汽车公司已经干了三个月了。一天刚收工，



工头把徐华清叫去，说是法国老板快要过“生日”，要他准备二十元钱的“寿礼”。并且故意提高嗓门说：“三天之内礼物不送来，你就另找生意吧！”

徐华清一天干十几个小时才拿几角钱，哪来二十元钱的“寿礼”？只得含恨停工。事后才知道，这原来是那个徐老板的一个毒计，是他通过他的流氓“老头子”兴妖作怪的结果。

那时，徐华清一家六口主要靠他养家糊口，怎能经得起长期失业的打击呢？被生活所逼，徐华清只得又一次来到建筑工地。

时间在流逝，仇恨在增长。老板在“百老汇”工程中的所作所为，越来越激起工人人们的愤怒。在第二年冬天，一场斗争终于爆发了。

这是农历十二月份，工人们都盼望着早日结算工资，度过年关。可徐老板却只顾自己发财，不顾工人死活，再一次拖欠工资。十六号发工资的日子又到来了。一放工，工人们一个个冒着严寒，聚集到老板的大院子里等发工钱。等呀等，一直等到半夜，也没有老板的踪影。徐华清和大伙一商量，决定给他点厉害看看。

第二天，徐华清他们一班“抢快”小工，一个都没有上工。老板得知消息，也急呆了。他心里明白，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让这批“抢快”小工走了，以后就别想在上海再干这一行了。因为，铁骨架第一阶段的施工任务，如果能赶在年前完成，英国老板就要预付四十万元给“大包”，他徐老板也能从中捞到不少油水。要是这个时候误了工期，不但快到手的几万元要吹了，而且一旦英国老板怪罪下来，更吃不消，他想到这里，擦了擦脑门上的冷汗，急忙下去找徐华清他们，答应马上发给

工资。

离新年还只有十天，而第一期工程距离结束还有一大截。“大包”急得把手下的包工头臭骂了一顿，一定要他们在三天之内把大厦顶层的“铁亭子”安装好。

那时，“抢快”行业工价上的层层盘剥是十分残酷的。造“铁房子”以吨论工价，每安装一吨钢材，“大包”老板接下的工价是十四元，转给“二包”老板为五元，再转包给“三包”老板又减为三元。虽然“抢快”小工平均每人每天可以安装钢材两吨，但每个工人所得的工资，每工一般却只有四角，最高的也不过七角。这种剥削是何等的残酷。“二包”徐老板急于赶工期，一时又找不到更多的“抢快”小工，便想要徐华清等现有的“抢快”加劲为他卖命。他盘算：“铁亭子”共计一百八十吨，如果给工人们三百元，那么自己还好净赚五六百元。于是，他就找徐华清他们说：“这铁亭子要能在三天内把它竖起来，保证不拖延工期。我给你们三十个人三百元钱，这可要比以往的工钱高出几倍啦。”

按照往常情况，竖起这座“铁亭子”，三十个工人每人按六工计算，最多只给百把元钱。现在老板突然“大方”起来，其中一定有什么鬼主意。徐华清把自己的想法同工人们一商量，大家决定团结起来，再整一整这个吸血鬼。于是徐华清他们就答复徐老板：“工人们不干！”尽管徐老板再三哀求，也没有用。

营造厂老板知道了，急忙亲自出马，派人直接找徐华清他们谈判。

“要三天竖起来可以，得增加人。”徐华清代表工人们说。

“人数随你们定。”

“今后，不准监工头和外国监工打人、骂人、欺压工人。”

“这个……这个条件不好办。”老板派来的那个家伙一碰到这个条件，一下子楞住了。

在工人们一致坚决要求下，最后，资本家不得不答应了工人提出的全部条件。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徐华清和工人们虽然采取各种办法同资本家作斗争，但由于政权掌握在剥削阶级手里，工人们还是摆脱不掉被剥削被压迫的命运。唯利是图的资本家，一当“铁亭子”安装好，四十万银洋一到手，便背信弃义，把答应工人们的条件赖得一干二净。外国监工照样打人，监工头照样欺压工人。工人们仍然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迎来朝阳青春焕发

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了。徐华清进了华东建筑机械厂，从此工作和生活都有了保障。

经过学习，他逐渐懂得，在旧社会干了整整三十年起重工，自己却吃不饱、穿不暖，一无所有。那是因为有三座大山压在劳动人民头上的结果。现在解放了，劳动人民翻了身，当了新中国的主人。现在干起重工，是为了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得更加美好。

解放后不久，毛主席发出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厂里接受了建造三河闸闸门的工程。徐华清积极报名，打起背包，同厂里两百多名工人一起奔赴淮北工地。

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激励着徐华清。在工地上他干劲冲天，日夜奋战。为了抢救国家财产，他跳进洪水，垫高发电机；为了抢在洪水期之前建造好闸门，他日思夜想，出主意、想办

法,把自己几十年的起重经验,用在为人民造福事业上。在兄弟单位的积极配合下,他们承担的工程终于比原计划提前了二十天,赶在洪水期之前,安装好了闸门。工程结束,他和同志们无不欢欣鼓舞。当他参加庆功大会,拿到印有毛主席像、毛主席题词的奖状时,幸福的泪花,禁不住夺眶而出。一个在旧社会忍饥挨饿的“抢快”小工,如今只是做了一个起重工应当做的工作,党和毛主席就给了这么大的荣誉,这怎么能不使他激动万分呢!

为了多炼钢,炼好钢,一九五八年,徐华清又和厂里一些老师傅一起,积极投入上钢厂翻造和安装炼钢车间的工程建设。那是滴水成冰的冬天,已经五十多岁的徐华清,却仍象小伙子似的,爬到高空操作。几十年前的隆冬季节,穿着破夹衣裤,在高楼大厦工地的高空中为老板卖命的情景,历历在目。现在,徐华清在党和国家无微不至的关怀下,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是为打击帝修反而战斗。现在工人头上戴的是安全帽,腰里系的是安全带,身上穿棉袄,手上戴手套……他愈加感到无比幸福,感到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起重工而自豪。安装炼钢车间,需要一辆十五吨履带吊车,但是要拆掉工地前面的几幢房屋,吊车才能开进工地。能不能既保存房屋,又加快工程进度呢?徐华清又发挥了老起重工的经验 and 智慧。他同大家一起研究,决定土法上马,不用履带吊车,改用把杆。先把钢材从房屋顶上翻吊过去,再把四十六尺长的大平炉抓到十一丈高的高空,然后就位安装。这样,不仅保存了房屋,还使原来需要三十七天完成的工程,二十天就完成了。结果炼钢车间提前了十七天投产。在这场战斗中,徐华清同志再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战鼓擂响了。徐华清回到厂里。在这些日子里，老徐师傅更加浑身是劲，哪里紧张，他就走到那里去干。

随着生产的发展，钢料仓库的钢材吞吐量很快加大，为了加速运输和代替笨重的体力搬运，厂里发扬了自力更生的精神，要制造一台土塔吊。领导上把他调到土塔吊上工作，他积极地装马达、安机器，并主动为设计人员和安装工人出主意。土塔吊正式投入生产了，他又想方设法，搞技术革新，不断提高土塔吊的载荷能力，今天改一个齿轮、明天改一个螺丝，使土塔吊从载荷三吨，提高到六吨、八吨、九吨。

现在徐华清虽然光荣退休了，但他并不满足于幸福的退休生活。他说：“我还要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出力，要继续革命到生命的最后一口气！”

上海市华东建筑机械厂工会整理

抚今追昔话手艺

——上海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工人郭金龙的回忆对比

我十三岁就进筑场学手艺，至今已有四十个年头。这四十个年头横跨两个社会，记述了旧社会的仇恨和新社会的幸福。

爸爸被害我进筑场

我出生在上海郊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虽说我阿爸有一手裁缝手艺，但也是三天打鱼二天晒网，根本就接济不了家里的急难。一天上午，阿爸正在财主家打短工。镇上地主陆剥皮的一个狗腿子突然跑来，对我爷爷说：“恭喜你家走运。陆先生从关外搞到几张紫貂皮，要做件皮袄，看中你家老大的手艺，叫他明天一早就去。陆先生讲，做得称心，工钱加倍。”爷爷虽不知道这“皮”多贵重，但陆剥皮在乡间的恶名他是知道的，于是就说：“这样高档的活他从没做过，况且现在他在外面打短工，一时也抽不出空。”那个狗腿子没容爷爷说完，脸色一变，立刻恶声恶气地说：“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推三阻四，陆先生要用他，哪个敢不去?! 陆先生是看了日子动工的，要他明天一早就去，错过良辰吉日，料你们也担当不起。”说完，转身就走。爷爷盯着狗腿子神气活现的背影，狠狠地啐了一口：

“呸！手艺人难道也受你陆家的管？”可是奶奶担心不去不行，就一边劝说爷爷，一边打发小叔赶去告诉阿爸，叫他作个准备。

阿爸虽说对貂皮活从没做过，但早年跟师傅时也做过一些皮货，再加他心灵手巧，缝裁精细，做这皮袄倒也并不为难。只是想到这老贼一向心狠手辣，现在一反常态，答应工钱加倍，想想总有些蹊跷。阿爸出于无奈，第二天还是到了陆剥皮家，天天提着十二个小心，精工细作，整整干了七天七夜，把这件皮袄总算做成了。

那天刚歇工，陆剥皮拎过皮袄试穿，满口赞声不绝地说这貂皮如何好，多么美，就是只字不提工钱。当时阿爸正心里盘算着如何开口，陆剥皮却突然“哇——”的一声叫起来，口里不住声地骂着：“你这野鸡裁缝，骗钱的货色，把件皮袄做成这个样子，叫我怎样穿着见人！”这下阿爸心里全明白，这是地主从鸡蛋里挑骨头，存心要赖掉工钱，阿爸是按尺寸细心裁缝的，哪会有半点差错？于是跟他据理力争。但地主老财硬是不容阿爸分说，逼着一定要赔他的貂皮。这时阿爸又气又急，想把皮袄抢过来，让乡邻评理。贼地主蓄意诬害，就一面把阿爸扣住不放，一面派人把爷爷拉去，非要立据赔款。爷爷气愤地说：“皮袄没做坏，要赔办不到！”说完，拉了阿爸要走。阿爸拿了裁缝包袱正要出门，冷不防地主儿子从斜刺里窜过来，一把抢过裁缝包袱说：“没这么容易，不赔，休想出门。”几个狗腿子也跳过来帮腔。这时，老地主站在一旁冷笑着说：“我这紫貂皮价值千金，料你们一时也赔不起，看在本乡本土面上，让你们先回去。但是，不赔我的东西，你就休想在这地方上再做裁缝。”阿爸一听满腔怒火，要夺回自己的裁缝包袱。陆剥皮气急败坏地嚎叫：“这穷小子想翻天了，快给我打出去呀！”于是几个狗腿

子急忙赶过来，又是拖又是打，拳头象雨点般落在阿爸身上。爷爷过去阻拦哪阻得住。就这样，爷俩被这群豺狼打出大门。

阿爸本来有肺病，现今又受了狗地主一顿毒打，又气又恨，病上加病，躺在床上整天干咳着。医治调养无钞票，伸冤报仇无门道。不几天，阿爸满口吐血，含恨死去。

阿爸死后，家里的生活更加困难了。为了减少家里的负担，我十三岁那年，叔叔靠亲戚帮忙，把我介绍到上海学泥水匠。

寻找出路偷学手艺

我第一天的学徒生活是在忙乱的伙房杂务中度过的。

一连几天的伙房杂差使我很纳闷：我是来学泥水匠的，不教我砌墙头，却要我围着锅台转，这算什么意思？一天，我和师兄谈起这些想法。师兄对我说：“拿泥刀还早着呐。我就当了整整三年伙头军了。”讲到这里，师兄压低嗓门对我说：“你刚来还不知道我们这一行的情况，到处都是这个样！老板花两角月规钱用个学徒烧饭，总是合算的。”

我这个十三岁的孩子，每天要烧几十个人的饭菜，一天到晚忙得喘不过气来。更可恶的是，老板为了防备烧掉他的木料，一定要我离开工地，到老板娘住处去烧，借此又可使老板娘多个替手。于是，我不仅要烧工地师傅们的饭，还要替老板家打杂差，这就更把我忙得晕头转向。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任务也一天天加重。工程任务紧缩时，吃饭的师傅减少了，老板又叫我到工地兼做小工。在工地上，我拌灰砂、运砖石、送泥灰、洗泥桶……样样都得干。在忙碌中，我也常常偷看老师傅砌墙头，想从他们的一举一动中

悟出个道理来。

就这样,三年过去了。我不知调换了多少工地,修补了多少泥桶,挑断了多少扁担,熟悉了多少师傅,但是老板还是不让我砌墙头。那时,有个四十开外的赵师傅,他看我手脚勤快,为人老实,待我特别亲近。一天下午,细雨绵绵,把脚手架淋得湿漉漉的。在旧社会,老板为了更多地克扣工人的工资,规定在下午三点前因雨歇工,这天就算替他白干。因此,为了挣得这天的工资,尽管我们的衣服全湿透了,但谁也不愿歇手。正当我挑着一担灰砂顺着竹扶梯往上送时,走在上层的一个小工不小心滑了一跤,一堆砖头撞翻下来。我重担压肩,哪里来得及躲闪,一块砖头不偏不斜恰好击中头顶。我一下子摔倒,殷红的血顺着湿淋淋的头发,和着雨水、汗水、泥水流满一脸。赵师傅闻声赶来,连忙从自己的破夹衣上撕下一条布片,帮我包扎,把我送回芦席棚。

晚上躺在草铺上,沉甸甸的脑袋象被铁箍箍紧似的,隐隐作疼。我心里又急又乱,哪一天能结束这烧饭打杂的行当呢?哪一天能拿起泥刀学习技术呢?又要到哪一天才能领到自己的工钱来分挑母亲的重担呢?思前想后,我怎能入睡。躺在一旁的赵师傅看到我翻来复去地睡不着,问我伤口疼不疼。我“嗯”了一声,禁不住掉出了眼泪。过一会,赵师傅又问我:“金龙,你已来三年多了,是吗?”我又“嗯”了一声。赵师傅又说:“老板是有名的刮皮鬼。他以前招来的徒弟,八、九年也不让他们满师。现在手段更辣了。”那时,泥工学徒终年无工钱,每年端午节和中秋节,老板拿出几个铜板给徒弟过节。以前,我也听叔叔说,邻村有个姓王的穷兄弟,到了一个老板那里学泥水匠,从十二岁学起,一直学到近三十岁,还是个烧饭的学徒,后

来忧愁成病，含恨死去。我想，这种命运会不会也落到我头上？这天听赵师傅一说，不禁打了个寒噤。我恳求赵师傅替我想办法寻个出路。赵师傅低声对我讲：“你以后看老板、工头不在，就到我这边来，先偷偷地学，学成后，他想关也关不住了。”我高兴得不知如何感谢赵师傅，恨不得马上就去学。

没等伤好，我就偷偷地干起来了。我有空就钻，见缝就挤，先练习披头缝、斩砖头等基本功，熟练后就在赵师傅那里学砌墙头。约摸过了三四个月，我就能帮着老赵师傅做点正经活了。

正当我一个心眼钻技术时，老板听到了风声，经常出乎意外地来到工地。有天傍晚，快歇工了，我想刚刚离去的老板决不会再来，就登上脚手架，操起泥刀干开了。谁知砖头还没砌上几块，老板突然在我面前冒出来，把脸一沉，冲着我说：“歪七歪八的，谁叫你砌？下去准备开饭！”我先是一怔，后来听他训了这么几句，心想也不过如此，谁知一场大祸就在后头等着呐。

次日中午，素来在家吃饭的老板突然决定要在工地上吃大锅饭。赵师傅估计他要干什么鬼名堂，就悄悄地关照我留神些。当我端菜盛饭完备后，刚要蹲下吃时，老板把饭碗一搁，指指夹着的一簇菠菜，唬的一声吼起来：“你存什么心？烧出这样脏的菜给老师傅吃，简直在我脸上抹黑！”话音刚落，他顺手操起脚旁的一把斧头，朝我扔过来，口里骂着：“小赤佬，烧烧饭还没烧好，就想练练翅膀飞了，真是不打不足训。”我急忙往后退闪，斧头已经落在腿上，鲜血顿时涌出来。我恨从心起，顾不得血流伤痛，操起脚旁的一根木料，想冲过去拚命。赵师傅怕我再吃亏，赶忙走过来，板起脸对老板说：“何必小题大做！砸伤了人你要负责！”其他师傅也愤愤不平，一个个围上来。老板深怕动了众怒难以收场，就自找扶梯下台阶，溜之大吉。



伤口发炎了，我病倒了，整日发烧，全身无力，躺在床上动弹不得。赵师傅搞来一些草药替我调治，但也无济于事，病情一天重似一天。老板看我一时难以好转，就打发我回家。

母亲看见我蜡黄的脸上双目凹陷无神，瘦骨嶙峋的身体走路一步三摇，心里一酸，眼泪直往下滚：“孩子，想不到逃脱乡下的虎口又落进城里的狼嘴。”

赵师傅又托人给我捎来一大包草药，要我安心养病。前后歇了两个多月，我拖着尚未痊愈的身体又来到上海。

一到工地，赵师傅就对我讲：“金龙，你就跟着我们做吧，不要再去烧饭了。工钱暂时全给老板。”经赵师傅他们一番周旋，老板想自己又可多一笔收入，就同意我跟工人们一起出工。不到一年功夫，我就能和其他师傅一样拿全工钱（每天六角）了，但我自己所领到的仍是两角“月规钱”。

又过半年多，赵师傅他们看我技术学得不错，就出面和老板交涉，让我满师。老板想不答应不行，就说：“叫他准备三桌满师酒。”明白人一听就知道这是存心刁难。赵师傅也来火了，就说：“他这几年为你挣的钱也不少了，你这样刁难他？”其他师傅也七嘴八舌地说他不讲理。老板明知理短，仍耍起花招，要我补完几个月的“病假”再满师。虽说补几个月，实际上又给他白白地干了半年多。我的学徒生活经过六年多的折磨，才算结束。

空有手艺怒摔泥刀

“满师了，一条活路算是闯出来了。”我心里总是这样想着。但是，俗话说：“后生手艺老郎中”，十年前父亲的悲惨遭

遇又浮现在我眼前，喜悦的心头一下子涌上了一团阴云。父亲不是也有一手好手艺吗？他的命运会不会落到我头上呢？乡下有陆剥皮那样的地主，压迫农民和手艺人，城里也有资本家压迫我们工人啊！

那年刚过中秋节，老板就下“逐客令”，板着脸对我说：“你翅膀硬了，出去飞吧。”我被他一脚踢出门，哪里是我的去处呢？我憋着一肚子气，收拾起铺盖，正要出门，赵师傅走进来问：“他就这样打发你走吗？”赵师傅看着我愁眉不展的脸说：“走吧，我去给你介绍几个熟人。”我十分感激，两行热泪滚滚而下。

赵师傅的熟人也是泥水匠，一个姓张，一个姓黄。

这天晚上，我和穷兄弟们睡在一起，怎么也合不上眼。听黄师傅说，在上海，建筑工人到处流动，从没一个固定的工作单位，都是在茶馆里等候包工头来招用，一天找不到活，就在茶馆里等一天。“会不会满师就失业呢？”我翻来复去地想着。“满师”——“失业”这几个字象着了魔似的，一直钻在脑海里不肯离去。

旧社会建筑业里的大小吸血鬼是靠转手包工层层剥削过日子的。那些靠恶势力开办营造厂的筑头，垄断着承包工程的大权，他们一方面和资本家勾结起来，瓜分各行各业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另一方面又通过转包工程榨取建筑工人的血汗。筑头从其他产业主、经商人、银行老板、洋行经理或伪政府要员那里包下工程后，就按工种转包给挡手；挡手又按工程大小、工期长短，转包给中客，中客再把工程分给一些小包，最后，由小包寻找穷工人去干。包工头利用这种转手包工制层层盘剥，大发横财。许多老师傅被生活所逼，不得不在极低的工价条件下替包工头卖命。特别到了冬天，因为夜长日短，一

天做不足十个钟头，冷天又不能施工，筑头往往停包工程去干别的行当。这时，包工头就更加横行霸道，工价压得更低了。老板就是采用这种包工制对工人进行残酷剥削的。年老体弱的工人遭遇更惨，往往整日泡在茶馆里也无工头雇用，最后被迫沿途讨乞着回家，甚至冻死饿死在途中。这套转手包工制，就象一条无形的锁链，牢牢地套在我们建筑工人的脖子上。

我们三个在茶馆里一连蹲了好几天，也没有找到活干。为维持生活，我们只得把衣裳、铺盖都送进了当铺。一天下午，想不到很久不见的筑头“丁麻皮”闯进来。对失业工人说：“我手里有笔生意，你们去做吗？”不一会，就找了十一个穷工人。我们三个也去了。二十几天的生活刚刚做完，丁麻皮就来工地，到处挑剔，说这也不合格，那也不象样。原来讲好六角钱一天的工钱，他却硬说生活做得不好，只值五角钱一天。我们一看他蛮不讲理，满腔怒火，当场和他争起来。他要出流氓手段说：“你们要六角钱一天，不给，就是不给！”说罢就溜了。第二天，我们再去找他讲理，他索性躲着不见人。后来我们又一连找了好几天，连影子也看不到。工钱，就这样被他白白地赖掉了。

自那以后，我对这行手艺失去了信心。当铺里的东西取不出来，连自己吃饭也成问题。思前想后，我又气又恨，一怒之下就摔了泥刀回到乡下。

获得解放手艺新生

乌云遮不住太阳。一九四九年五月，我们家乡解放了！我带头参加民兵，用枪杆子保卫翻身农民的胜利果实。不久，我又担任民兵大队长。

一九五一年，组织上把我送到国营建筑企业工作。当我又一次拿起泥刀时，心中真是百感交集：泥刀啊泥刀，旧社会，你记述着我们手艺人的千般苦万般恨，解放了，你也开始了新生，跟着我走南闯北，为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添砖加瓦。

一九五八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新的革命征途，我劲头更足，方向更明。我竭尽全力积极工作，曾多次被评为公司先进生产者。

一九六五年，组织上选派我到技工学校担任泥工教师。旧社会的穷泥工上了讲台，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抚摸着身上旧社会留下的伤疤，看着新一代欢乐的笑脸，一幕幕往事又在我眼前浮现。对比我学手艺的遭遇，这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啊！为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红色江山，必须教育下一代。这是我们老工人的光荣职责。遵照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的教导，我经常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对年青一代进行阶级教育，使他们不要忘掉老工人在旧社会的苦，知道现在的幸福来之不易；帮助他们树立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坚定不移地走又红又专的道路。

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这是我永生不会忘记的一天。就在这天，我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幸福地见到了日夜想念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旧社会，我们泥水匠不如一棵草；新社会，共产党、毛主席把我们当成宝。每当我想起这幸福的时刻。就心潮澎湃；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们劳动人民能够翻身作主把家当，全是靠您的好领导啊！我一定跟着你干一辈子革命，那怕山崩地塌也决不动摇！

上海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工会写作组整理

两代木工的恩和仇

——上海市门窗加工公司工人徐其根的家史

早晨，朝霞映红了上海木材加工二厂的大门，大门两旁的墙上，“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大幅标语，显得格外光彩夺目。上班时间还没有到，许多工人已经提早到厂，准备迎接新的一天的战斗。突然，一辆急驰的摩托车在门口“嘎”地一声停住了，邮递员跳下车来，送来了一份电报。守护员老王接过一看，电报注明“徐其根同志”，就急匆匆地去找徐师傅了。

木工徐其根，今年五十八岁，方正的脸膛黑里透红，两只眼睛炯炯有神，中等个子，身板挺结实。这天，老徐师傅一大早就来到厂里，正在大批判专栏前和几个青年工人贴批判刘少奇、林彪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罪行的大字报。老王找到了他，就把电报给了他。徐师傅接过电报一看，不由得愣住了。原来，这份电报是他失散了三十多年的女儿金娣打来的，说她带着小外孙女今天上午到上海与他见面。

徐师傅反复看着电报，不由得悲喜交加，思绪翻滚。旧社会逼得他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而新社会，在党的关怀下，他就要同失散他乡的亲人团聚了，这怎么能叫他不激动呢！此刻，徐师傅热泪盈眶，几十年前的往事又一桩一桩地展现他的

眼前……

旧社会家破人亡

徐其根出生在上海浦东高桥徐家路滩一个贫苦木匠的家庭。一家八口人，只靠父亲徐才才在上海做木匠过活。其根出世后，家里又添了一张嘴，父母为了维持这个家，只得狠了狠心，把其根的大姐提早出嫁，将两个十岁刚出头的哥哥送出去学木工，实指望这样日子可以好过一些。可是在那吃人的旧社会，哪有穷人的活路呢？两个哥哥人小体弱，在资本家令人难以忍受的摧残下，没有多久，相继而亡。全家生活的重担仍落在其根父亲一个人的肩上，终年过着半饥半饱的艰难生活。

一九一九年腊月三十，地主家杀猪宰羊，张灯结彩。可是徐其根家却冷灶冰锅。全家人都眼睁睁地盼着其根父亲能拿点钱回来过新年。他们盼呀盼，总算把徐才才盼到了家。可是，徐才才辛苦劳累了一年，只落得两手空空，连铺盖卷都进了当铺。

这数九寒天，资本家穿皮袍，煨火炉，过着花天酒地的糜烂生活，而徐其根一家却是揭不开锅，饥寒交迫。为了全家人的生活，徐其根父亲只得每天跑茶馆，焦急地等待着工头来招工。可是在这建筑行业的淡季里，要找工作真是难上难呀！徐其根父亲接连等了半个多月，还是不见有工头招工，真是心急如焚。一天，徐才才又象往常一样，来到茶馆。这时，走来了一个头戴呢帽，身穿皮衣的人，张开喉咙说：“众位老师傅，我徐某在徐家汇斜土路那里有一场生活，现在正缺少几个木匠，

谁愿意去？”木匠们一听，都围了上去。这人看到这伙穷木匠上钩了，脸上闪过一丝得意的微笑，逼进一步说：“这场生活本小利薄，工资只有平时的三分之一！”徐才才为生活所逼，就和几个穷兄弟一起应诺了下来。

第二天，天还没有亮，徐才才就穿上薄衣单裤，空着肚子，顶风冒雪赶往工地去了。

那时候造房子，四周只有一点点毛竹脚手架，上面放着一块二十公分宽的木板，算是给人干活时站用的。除此以外，工人干活没有扶手、没有安全帽、安全网，更不用说什么保险带了。这一天，北风裹着雪花，刮得脚手架吱吱叫。徐其根父亲捎着一根木料在积满雪花的木板上艰难地走着，突然，一个踏空，便直摔下去，跌得血流满面，人事不省。那些贪得无厌的老板、工头根本不管工人的死活。工友们只得把奄奄一息的其根父亲送回了家。其根家本来就连吃饭也顾不上，哪有钱为父亲治病！没过几天，父亲便大口大口地吐血死了。

父亲一死，好象房屋断了梁，一家老小怎么过下去呢？母亲含着眼泪，把其根的第二个姐姐送给人家当童养媳，不久，又把刚满十岁的其根送到上海去学木匠手艺。就这样，吃人的旧社会逼得徐其根一家东奔西散、家破人亡。

死里逃生出虎口

徐其根一人在上海过着孤苦零丁的日子。十几年之后，他成了家，添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

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上海。豺狼成性的日寇到处抢掠烧杀，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这兵荒马

乱的年头，哪里会有人兴土动工，翻建房屋的呢。其根一连几个月找不到一点活干，只得回到家乡，给地主做杂工。

一天傍晚，其根在家里正愁着往后的日子怎样过，营造厂瞿老板金根笑眯眯地走了进来。他环顾了一下破屋子，酒糟鼻子一翘，装出一副关心的样子说：“没有活做了吧？”姓瞿的见其根没有吭声，就又装模作样地说：“我今天特地从上海赶到乡下来，就是不要忘记你这个老伙计。”一边说，一边把两手伸到口袋里，加重语气说：“芜湖有个工程正需要木工，去四个月就可以完工回来，每月工资三十三元，而且还预付二十元安家费。怎么样？”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叠伪钞晃了晃，小眼睛眯成一条线，“嘿嘿”地干笑着。

其根望着老板这副异样的表情，心想：豺狼岂会有好心。但当他想到生活的重担，便答应下来。

第二天一清早，其根背着铺盖、凿箱，告别了满面泪水的妻子儿女。可是他哪里知道，等待他的又是一个灾难。

这天，其根和二百多名泥木工人在日本鬼子的刺刀下，被赶进了大铁箱般的轮船统舱内。不一会，船离开了码头。原来，其根他们是被骗到东北长春去替日本鬼子修筑工事和兵营的。以前已经去过四批人，至今还没有人回来过。瞿老板为了捞钱，偷偷地和日本鬼子订了合同，以每个工人七十五元的价钱把他们给出卖了。工人们知道这个情况后，肺都要气炸了。他们蹲在又闷又热的船舱里，痛斥着瞿老板和日本鬼子的罪行，纷纷表示要坚决跑回去，决不给鬼子做工。其根也暗暗打定主意：一有机会就跑。

船到青岛后，鬼子逼着工人们排队出发。其根故意排在队伍最后面，乘一个偶然的时机，他机智地拔腿跑进了旁边的一

条小巷，接连拐了几个弯，逃出了虎口。

暮色已经降临。其根走在小路上，人生地疏，举目无亲，铺盖、工具都丢了，到哪里去安身呢？突然，“昌盛营造厂”几个大字，映入眼帘，其根一时有了主意。当夜，他就在这个厂的木堆缝隙中蜷缩着身子，露宿了一夜。清晨，其根整了整被露水打湿了的单衣，往昌盛营造厂的红墙房子走去。老门房知道了其根流落异乡的困境，非常同情，就领着其根去见老板。老板见其根是外乡人，找不到铺保，就要花招刁难其根，故意吞吞吐吐地说：“既然如此，那么我就担起风险把你留下。不过，我只管饭，不管钱。如果你答应的话，就留下来做生活，如果要工资的话，那么，就请你另找门路。”

其根到了这时候，才明白了胖老板的狠毒用心。真是天下乌鸦一般黑，老板都是黑心肠。上海的老板把他卖了，青岛的老板又乘人之危，不花分文要他当奴隶。这是什么世道！可是眼下他是走投无路，进退两难哪，其根只得暂且在这儿安身。

从此，昌盛营造厂的老板把徐其根当牛马使唤，把成批成批的木工生活向其根身上压，每天只给几只窝窝头吃，难得有半顿酸米饭。

秋去冬来，天气转冷了。由于在逃跑中丢失了铺盖，其根只能在木棚的屋架上搁几块木板作为床铺，找了几只破麻袋装进一些刨花作为棉被，和衣躺着。初冬的寒风，“嗖嗖”地刮来，冷得其根直打寒噤，根本无法入睡。这种生活使其根再也忍不住了，他鼓足勇气，找到老板说：“我已替你白干了三个多月活，现在天气转冷，也该让我添条棉被了。老板一听，顿时就板起脸说：“什么？我好心把你收留下来，现在还要向我要

棉被，那有这种事，你向我要，我向谁要？没有，你愿留就留，不愿留就走！”

工人们闻讯后，都很气愤。老门房说：“其根弟，在这里呆下去也不是长久之计，我看你还是回上海吧，没路费，咱穷哥儿们凑。”其他工人也说：“对，咱们凑些钱给你回上海，别在这里受老板的罪了。”当天下午，其根拿着工人们凑起来的钱，买了船票，含着激动的泪花，告别了工人兄弟，离开了青岛。

受逼迫妻离子散

其根回到家里，已是衣服破烂，蓬头垢面，简直不象个人样了。一连串的苦难遭遇，使其根明白了：在那暗无天日的社会，千条路，万条路，没有劳动人民一条路啊！他恨透了这吃人的社会，也怨透了木匠这个行当。为了养家活口，他决心另谋出路。

从此，其根开始了推独轮小车的生涯。每天天不亮，其根推着小车到货站装上几百斤的货物，在高低不平的小路上奔跑，累得精疲力尽，可是每天的大部分工资，却落到了车把头的手里。

有一年冬天，北风呼啸，田野一片枯黄。一天清早，其根照例推着小车去上工。苏北刚运来了一船猪。车把头叫其根和一个工人一同下船舱缚猪。一头，二头……两个人使尽了力气，总算把一船猪缚完了。可是上岸后，车把头还要其根把剩下的两只大肥猪运走。这时的其根混身的骨头就象散了架一样，哪里还有力气把三、四百斤重的两只肥猪运走！车把头见其根不响，把脸一沉说：“你今天不把猪运走，工钱就不

给！”其根一听，气得话也说不出来。车把头又威胁说：“不把猪运走，哼！今后别想在我这里混饭吃！”说完，扬长而去。其根真想上前拉住车把头论理，可是码头上到处是这些地痞流氓的恶势力，他们会同穷小工讲理吗？可不推车，一家人又怎样生活下去呢？其根只得硬着头皮，拖着又饿又累的身子去捉猪。正当揪住那只肥猪的耳朵时，猪猛一挣扎，张开大口咬掉了其根一截手指。顿时，其根感到天旋地转，连心的疼痛使他昏厥了过去。

工友们把其根送回家，没几天，手指腐烂起来了。他不能再去推车了，全家的生活就更难熬了。

转眼新年到了，其根一家人却蹲在四面漏风的小屋里，围着冷清清的灶头发愁。三岁的儿子和六岁的女儿在妈妈怀里嚷着要吃东西，其根望着叫嚷的孩子，心如刀割。他想了许久，拿定主意，对妻子说：“金娣妈，这样下去不行，等着饿死，不如另找活路。我打算到外面去寻些零活，你带着孩子回到娘家住些日子，等我挣了钱再来接你们，你说好吗？”妻子想想也没有别的路走，也就同意了。

新春初五的早晨，正当财主人家放爆竹接“财神”，大吃大喝的时候，其根一家却被黑暗的旧社会逼迫得分离了。其根把妻子儿女送上了去启东的便船，他眼里噙着泪花，站在岸边，一直望到帆船隐没在迷雾中。

原来其根妻子娘家也十分穷困，娘儿三人去了，日子就更加艰难了。妻子托人写信给其根，要他设法接他们回来，可是一直渺无音讯。她在娘家等了几年，实在没法活下去了，只得把七岁的男孩子送了人，又把刚满十岁的女儿金娣送给一家有钱人家当丫头，自己被迫改嫁了。

吃人的旧社会，夺走了多少穷人的生命！拆散了多少穷人的家庭！其根一家的悲惨遭遇，只是旧中国千百万劳动人民受剥削，受压迫的一个缩影。徐其根饱尝了人间的辛酸，只落得个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命运。从此，他孤身一人，漂泊、流浪，在饥饿线上挣扎。难道他只能永远忍受和他父亲一样的命运？不！其根他多么希望彻底摆脱这种深重的苦难，他盼星星，盼月亮，盼望着东方出太阳，他坚信这一天定会来到！

得新生当家作主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了。

徐其根含着欢欣的泪花，挤在人群中欢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昔日的奴隶，今天翻身作了主人。党把徐其根和其他泥木工人都组织起来学习。通过学习，徐师傅明白了：是旧社会地主、资本家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剥削，使得他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是共产党和毛主席给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新生。他深深地懂得了：只有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工人阶级才能当家作主人；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广大劳动人民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一九五八年一月，其根师傅作为建筑工人的代表，去参加北京的十大工程建设。这一天，车站红旗飘扬，锣鼓喧天，在一片欢送声中，火车徐徐地开出了上海站。徐师傅坐在软席卧铺上，兴奋地望着窗外祖国的锦绣河山，不禁想起了解放前的苦难遭遇，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想想过去，看看现在，他恨不得马上飞到北京，投入战斗。到了北京，徐师傅被分配在“迎

宾馆”工地建造迎宾楼。在毛主席居住的地方盖大楼，徐师傅感到这是最大的幸福。他每天起早贪黑忘我地工作着。工地领导同志几次劝他休息，可是等领导同志一转身，他又大干起来。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徐师傅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不断提高自己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狠批刘少奇、林彪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他激动地说：“是党和毛主席给了我一切，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给劳动人民带来了今天的幸福生活！刘少奇、林彪妄想开历史的倒车，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使我们劳动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我们坚决不答应！”

.....

今天，当失散了三十多年的女儿站在徐师傅面前时，他再次深深感到红太阳的温暖，不由得心里一阵激动，热泪盈眶。看看女儿又望着白白胖胖外孙女，他深有感慨地说：“多么可爱的孩子。她生长在新社会，多么幸福！可我们一定要使他们懂得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一代一代传下去，继续革命，永远前进！”

上海市门窗加工公司工会写作组整理

团结斗争求解放

——上海市第八建筑工程公司工人胡成德的家史

灿烂的阳光，照的人们暖烘烘的。上海市第八建筑工程公司的大门口挤满了人，欢迎进驻上层建筑的工宣队同志胜利归来。只听见有人说：“来了！来了！”顷刻，欢乐的锣鼓声震耳欲聋地响起来。

汽车停定，第一个跳下车的是五十多岁的胡成德老师傅。他身穿一套洗得发白的工作服，饱经风霜的脸上显露出刚毅的神色。

公司党委负责同志迎了上去，和胡师傅他们热烈握手，祝贺他们进驻上层建筑为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出了贡献，欢迎他们回到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胡师傅却谦虚地说：“我们的工作离党的要求，阶级委托距离还很远。为了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还要不断努力，继续革命。决不能让那些新老资产阶级重新骑到我们劳动人民头上来……。”

不知内情的人，还以为胡师傅勉励大家，但熟悉胡师傅身世的人却都知道：这短短的几句话正是表达了胡师傅发自内心的真实感情。

工友遭难闹罢工

胡成德的家乡在浙江宁海农村。他出生不满三个月，给地主当长工的父亲就累得吐血死了，留下了一笔二十担米钱的债务。母亲在债主百般逼迫下，忍痛把成德的两个哥哥抵押给债主家去放牛，把成德的姐姐也卖给人家当了童养媳。苦撑苦熬的日子过了五年，村里闹灾，生活实在过不下去，妈妈只得又把小小的成德送进了孤儿院。成德在天主教神甫的皮鞭下，被折磨了整整七年。当他再和妈妈见面的时候，只剩下一把骨头和浑身的疥疮脓血。为了生活，在家呆不到一个月，十二岁的成德又离开家乡，到宁波一家水木作坊里当学徒。不幸，在学徒生活的第七个年头，他的一只脚给木料压伤，化脓腐烂了。水木作坊老板一看成德不能再为他赚钱，就一脚把他踢出了门。成德回到家乡不久，正逢上日本鬼子实行“三光”政策，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他家仅有的两间破草房，也被日本鬼子烧成灰烬。妈妈怀着满腔的悲愤，带着成德一路讨饭来到上海。经过早年熟识的阿根师傅的介绍和作保，成德才进了“傅洪记”营造厂做木工。

一九四六年冬天，朔风怒号，阴气沉沉。一清早，码头边上正在建造的四层楼仓库里，已传出“咚咚！咚咚！”的榔头声音。胡成德和几个工友已经在干活了。

一扇扇四米长、二米宽的大门歪斜地堆在四层楼的水泥地上。胡成德和一个名叫张长生的工友搭档，站在高脚凳上装门。

“成德，冷吗？我的手都冻麻木了。”长生搓着双手说。

“嗯，我的手也没有知觉了……”成德的话还未说完，忽听得一个破锣似的声音朝他们吆喝着：“喂，手脚介慢还讲啥个闲话！今朝装不好二十扇门，你们不要想拿到工钱！”成德回头一看，是营造厂傅老板姨太太的堂房兄弟。由于傅老板是靠巴结英国大板做码头工程的，他凭着裙带关系，便在码头上当了工头，成为英国大板和傅老板的一条忠实走狗。这家伙平时为虎作伥，欺压工人，敲诈勒索，无恶不作。因为他姓丁，所以工人们都称他为“钉头”。

就在上个月，“钉头”借口儿子满月，乘机“打秋风”，强迫工人送礼。成德串连了张长生、阿根师傅等一批工人没有睬他。“钉头”就此怀恨在心，时时找岔子刁难他们。现在，他歪带呢帽，嘴叼香烟转游过来，把已经装好的五扇门看了一遍，忽然象发现了什么似的说：“啊，门要拆下来重装，不合格！”

胡成德问道：“什么地方不合格？你倒装一扇给我们看看！”

“钉头”眨巴了两下眼睛，蛮横地吼叫道：“我说不合格，就是不合格！你们要不拆下来重装，我就扣你们的工钱。”说完，返身扬长而去。

胡成德不禁怒从心起，“呸”地一声，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沫说：“不睬他！”张长生用榔头敲着一只钉子，冲着“钉头”的背影，一语双关地高声说：“我看你这个‘钉头’硬，还是我的榔头硬！”

“钉头”似乎听到了什么，转过身来，待要发作，但又找不到什么借口，只得虚张声势地威胁道：“你们不要嘴巴老，总有你们哭的时候！”说着便悻悻地走了。

阵阵北风吹来，刮得装了一半的门扇摇摆不定。胡成德

便找了几块木片，分别塞在几扇门下面的水泥地上，使几扇门固定起来。正当两人站在高脚凳上安装的时候，不料“钉头”又转游回来，贼头贼脑地走近一扇门，东张西看，趁成德两人不备，便一脚踢掉了门扇下面的木片……。当成德他们装到那扇门的时候，猛然一阵狂风吹来，大门“砰”的一声合拢了。成德只听见“啊”的一声惨叫，定神一看，只见正在装绞链罗丝的张长生的手轧在门扇和门框之间。等到成德推开门扇，长生已经痛得昏死了过去。左手被轧得皮开肉绽，血流如注，指骨都被轧断了。

胡成德急忙叫来几位工友。大家把长生扶到躺在避风处的门板上躺下，找来一些破布替他包扎伤口。成德一面包扎，一面疑惑地说：“刚才我特地用木片把门固定好的，怎么一阵风就出了毛病？”

一位工人说：“长生出事前几分钟，我看到‘钉头’从这里慌慌张张地走过去，莫不是他搞的鬼！”

一句话提醒了成德，他走到现场一看，两块木片果然已经远离门扇，说明事故完全是人为的。胡成德怒从心头起：“这狼心狗肺的贼工头，好狠毒啊！”

“成德你看，‘钉头’在木堆背后，还探头向这里张望呢！”另一位工友手指着木堆说。

“走，找他算账去！”胡成德同两位工友向木堆走去，但“钉头”早已溜掉，整个码头上都找不到他的人影。

胡成德便要几位工友照顾张长生，自己甩开大步去找老板。从写字间一直找到老板家里，只见老板穿着皮袍子，靠着火炉，正在同几个人叉麻将。老板看见成德气喘吁吁地跑进来，以为出了什么事，惊恐地瞪着眼睛问：“什么事情？”当他听

说是张长生受了伤时，便双手和着麻将牌，不紧不慢地说：“大惊小怪！谁叫他自己不当心的。”

“不是他自己不当心，是‘钉头’故意捣乱造成的。你应该马上送长生到医院去看！”

“我相信丁先生不会同你们一般见识的。即使是丁先生弄伤了他，也没有送医院的道理。真是笑话，哪有工人受了点伤就送医院的！”老板轻蔑地说。

“我们工人怎么样？”成德气愤地说，“长生上有老，下有小，做一天吃一天的……”

不等成德把话讲完，傅老板不耐烦地挥挥手说：“去、去、去！关你什么事？你快给我去装门，要是耽误了我的工程，看我不罚你的工钱！”

老板如此蛮不讲理，包庇工头，视工人的生命不如一棵草，把胡成德气得把牙齿咬得格格响。老板、工头狼狈为奸吮吸工人的血汗，才过着这样奢侈淫逸的生活啊！

可是现在长生还躺在工地上，先送长生治伤要紧。胡成德想到这里，强压住满腔怒火，赶回了工地。大伙儿凑了几个钱，送长生到医院去看了一下，再把他抬回家去。

第二天一早，胡成德怀着一腔愤恨来到工地。大伙儿议论起昨天长生受伤的事情，个个咬牙切齿地咒骂“洋奴老板”、“工头走狗”。阿根师傅愤怒地说：“这几年，老板、工头压得我们透不过气，这一次决不能饶过他们，一定要严办凶手，赔偿医药费。”

“对，跟这些洋奴走狗斗！”大家一致表示赞同。

正在议论的时候，忽然长生的妻子满脸泪水地赶来，告诉大家：长生的伤口得了“破伤风”，已在凌晨含恨死去。如今尸

首还搁在床上，……。

工友们听到这个噩耗，都悲愤填胸。成德猛地挥了一下拳头，大声地说：“走，找老板去！”

“一定要严惩凶手，要老板发给抚恤金！”阿根师傅坚决地说。

“找老板算账去！”大伙一声喊，纷纷扔掉了手中的工具，向老板家涌去。

老板从睡梦中惊醒，急忙从楼上下来，一见这么多工人，心里有点发慌，色厉内荏地喝道：“你们不干活，都来这里干什么？！”

胡成德指着长生的妻子说：“她丈夫死了，完全是‘钉头’害的。一定要严办‘钉头’，马上给她抚恤金安排家里！”

老板一听这两条要求，就象要割他身上的肉一样痛，鼻子一哼说：“是不是丁先生害的，还要详细调查。要什么抚恤金，在我傅洪记营造厂里没有这个规矩。”说着就要朝里走。

成德拦住他，说：“长生是被‘钉头’害死的，我们在场的几个人都可以证明。他一家老小今后的生活你要负责。”

“叫我负责？”老板瞪起牛眼威胁说，“胡成德，我劝你少管闲事，不要自找没趣。”

工人们一听老板讲这种混账话，都气愤得嚷了起来。老板眼看硬的不行，便要起滑头来：“你们说是丁先生害的，那你们就去找丁先生，到警察局去告他好了，我管不着。”说完，乘工人们不备，便窜进房间里，把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工人们到处寻找“钉头”，却连个人影也没有。事后才知道，老板昨天就把“钉头”藏起来了。到警察局去告他？谁都知道，傅老板巴结的英国大班，在英国领事馆里兼着职务，勾

结国民党反动政府，横行不法；而老板的三弟又在伪警察局里当“包打听”，告到警察局去，还不是送到老虎嘴里？

工人们只得凑了点钱，把长生的妻子送回家去，帮助她料理了长生的后事。

回到工地，工人们个个义愤填膺。看看长生的遭遇，想着自己的境况，都越想越气。这时，阿根师傅大声地说：“工友们，洋奴傅老板不把我们工人当人看待，我们不替他卖命了。他不答应我们提出的两个条件，决不复工。”

胡成德也说：“对，我们不干了！上次老板的老子死了，他把和尚请来做‘道场’。我们工人被他的工头害死了，非但不惩办，连抚恤金都不给，简直不把我们工人当人哪！”大伙扔下手里的工具，罢工了。工地上顿时变得冷冷清清。

罢工继续了五天，码头上的仓库没有造好，货物都堆在露天，越积越多。这时，洋行总管英国大班发急了，把傅老板找去，密谋平息这场罢工。在工人们的斗争下，英国大班和老板被迫发给张长生的妻子一些抚恤金，给“钉头”以“开除”处分。其实，所谓“开除”，也不过是掩人耳目，只是把“钉头”转到英国大班的另一个码头上当工头，继续作恶。

团结工友斗老板

大雪纷飞，转眼间，一九四七年年关将近。一天，成德拖着劳累的脚步下班回到家里。妻子一见面就问道：“工钱发了吗？”

“没有。老板自己花天酒地，却扣压我们的工钱不发。”成德拍打着身上的雪花回答说。

妻子叹了口气说：“家里没有米了，油酱店的老板又来讨债。怎么办呢？”

胡成德只得说：“我再出去借借看吧。”说罢，他拖着沉重的脚步，出门找熟人借钱去了。

成德刚走，阿根师傅和另外两位工友来到成德家里。一见成德不在，阿根师傅就问成德的妻子：

“成德兄弟呢？”

成德的大孩子天真地抢着对阿根师傅说：“阿爸去给我们借钱买米去了。”

阿根师傅一听，知道成德家里已经断炊了，便掏出身边仅有的一点钱，说：“先去买点米，给孩子烧点饭吃了再说。”

成德妻子连忙摇头说：“不，不，成德马上就会带回来的。”

阿根师傅真挚地说：“都是穷兄弟，还客气什么！”随即叫另一位工友去买了米来。

过了一会，门“吱”地一声被推开了，胡成德带着一股寒风走进来。他出去跑了一个晚上，找了好几个人，一分钱也没借到，又冷又饿，失望地回到了家里。一进门，他见阿根师傅等人都在，又见桌上放着一只装了米的布袋，事情明白了大半。成德走到阿根师傅面前，拉着他的手说：“阿根师傅，你……”感激得不知说什么才好。

接着胡成德气愤地说：“这工钱拖到现在还不发，老板会不会在里面搞什么鬼名堂？”

阿根师傅点了点头说：“是啊，我也正在捉摸这件事呢，物价天天涨，老板把我们工资拖延了五天还不发，叫这么多工友怎么生活？！这几天，许多工厂、学校罢工罢课，游行示威，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我们那个洋奴老板克扣我们工资，存心

不让我们工人活了，我们也要同他斗……”

阿根师傅的话还没说完，忽听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门猛地被推开了，只见在老板家打杂的学徒工小春闯了进来，后面还跟着几位工友。小春气喘吁吁地说：“阿根师傅，我到处找你，老板他……”成德见小春这副样子，就替他倒了碗开水，又招呼其他几位工友坐下，叫小春慢慢地讲。

小春喝了点水，坐下喘了口气说道：“今天午后，我正在烧开水，看见一辆小汽车开进来，里面走出两个夹着皮包的军官，老板点头哈腰地陪他们在客堂间谈话。我乘送茶、冲水的机会，断断续续听到他们说有一万听煤油，好象是合伙做买卖。这两个军官走了以后，管账在后房间问老板：‘这批工人的工资什么时候发下去？这几天工人天天来催，都快闹翻天了。’老板回答说：‘急什么！等那批煤油脱手以后再发也不迟。这几天煤油价格上涨，再等几天。’我听了这话才明白，老板扣压大家的工资不发，原来是在做投机生意。我趁老板出去的机会，抽空出来告诉你们。”

大家一听小春传来的消息，肺都要气炸……阿根师傅忿忿地说：“老板扣发我们的工钱，勾结国民党当官的搞投机倒把，等他发了横财，再发给我们那不值钱的钞票。老板的手段真毒辣啊！”

胡成德愤怒地把拳头在桌子上狠狠一捶说：“老狐狸，好狠毒，同他斗！”

几个性急的工友跳起来说：“走，找老板评理去！”说着就要往外跑。

“不要性急，单靠几个人去不行，大家再好好商量商量。”阿根师傅赶忙拦住他们，又想了想说，“这样吧，我们今晚分头

去串联一下，明天早上大家一起去找老板，揪住他的狐狸尾巴。人多势众，不怕他耍花招。”

第二天，成德一早到了工地上。没多久，工友们陆续到齐了。由阿根师傅和成德领头一齐朝老板家走去。到了老板家门口，铁门关着，知道老板还在睡觉，工人们就在外面喊了起来。学徒工小春一见老师傅们来了，就跑出来开了大门，把老师傅们让了进去。傅老板被工人喊声惊醒了，下楼一看，工人们都涌在院子里，他就恶狠狠地盯着小春说：“谁叫你开门的？”说着就要打小春。

阿根师傅上前护住小春说：“老板，是我们叫他开门的。”

傅老板转脸对着阿根师傅叫道：“大清早的，你们来干什么？！”

“我们来要工资的，你已经拖欠了五天了。”阿根师傅平静地说。

傅老板一听，眼睛一翻说：“工资？英国大老板还没有拨款下来，我哪来的钱发工资？我也在等钱过年呢！”

阿根师傅接口说：“那怎么行！你说英国大班还没有拨款下来，那就请你和我们一起到英国大班处拿钱吧！”

傅老板说：“我没那么多闲功夫，要去你们自己去吧。”说着就想溜进屋去。可是工人们一下围住了他，纷纷叫道：“不行！要去就一起去！”

“你是老板，一定得你去！”

傅老板一看不能脱身了，硬的不行，就用软的。他假惺惺地嘻笑着说：“哦，这点事就别去麻烦大班了，我……”

“你别装蒜了！你倒底把我们的钱弄到哪里去了？”胡成德紧紧抓住，不让他滑脚。

此时，傅老板慌了手脚，哭丧着脸说：“我也知道大家困难，不过现在银根很紧，生意又亏本，不瞒大家说，我也不好过年啊！可是我们也是多年的老交情了，我也体谅大家的。这样吧，大家先拿点钱回去过了年再说吧，等英国大班款子拨下来，再算工钱。”

“不行！把我们的工资都发给我们！”大家异口同声地说道。

傅老板见软硬都不行，干脆耍起无赖来了，说：“我体谅大家，可大家却不体谅我，那我也实在无能为力了。”说着一面打呵欠，一面把两手一摊，装出无可奈何的样子。

成德看着老板一副癞皮狗的腔调，气愤地指着他的鼻子说：“你讲没有钱，那你买煤油的钱是哪来的？！”

大伙跟着说：“对，你买煤油的钱是哪来的？快说！”

傅老板一听到煤油，顿时脸色发白，但还强作镇静地说：“什么煤油？你，你不要胡说！”

成德逼上一步大声地说：“老板，你不要装模作样了。你扣了我们的工钱，同当官的一起囤积煤油，做投机生意，获取暴利。这不是要饿死我们吗？你不让我们活下去，你也别想过年！”

傅老板见揭了他的老底，真是又气又恨，他看看脱不了身，理屈词穷，只得答应马上发工资。

这次斗争，虽然在社会上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斗争的革命洪流中，揪住了傅老板的狐狸尾巴，打击了他的嚣张气焰。但是，当工资发到工人们手里，物价已涨了几倍了。成德一个月的工资只买到了一斗黄糙米。

护场斗争迎解放

一九四九年春天，解放大军逼近了上海。炮声传来，成德和工友们都欢欣鼓舞，可是傅老板却整天愁眉苦脸，惶惶不安，平时那副飞扬跋扈的神气没有了。工人们看了心里都暗暗高兴。有一天，成德正在工地上干活，突然一个工人说：“你们看，老板今天小轿车也不坐啦！”成德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只见傅老板夹着皮包走进了写字间，没多久，又低着头走出去。大伙正在议论，只见小春急匆匆地走来，对成德说：“胡师傅，老板又出新花头了，这两天他把小轿车卖掉了，把一根根金条装箱运到国外去了，今天又听说他要解雇你们！”

“什么，要解雇我们？”大伙都被这意外的消息惊呆了。半晌，阿根师傅才说：“他想把我们解雇了借口倒闭，好把这笔资产也变成金条抽逃到外国去。这绝对办不到！他的这些资产，都是我们从身上搜括去的。决不能让他偷逃到国外去，我们一定要截住他！”

成德接着说：“对！解放军马上就要开进上海，我们决不能让老板偷逃资产。只要我们大家齐心协力，抱成一团，就不怕他施诡计，决不能让他达到目的！”商议定当后，大家干脆不做工了，监视着老板的动向。

两天后的上午，傅老板夹着皮包，摇摇晃晃地走来了，后面还跟着他那个在伪警察局做“包打听”的三弟。他们走进写字间后，就派人来叫阿根师傅、成德以及其他几个工友进去。成德和阿根师傅等几个工友一进写字间，傅老板一反往常地站了起来，假作殷勤地说：“啊！诸位老兄辛苦了，请坐，请坐。”

接着又拿出烟盒子，打开来送到每人面前说：“来，来，大家品品味道。”可是，工人们谁也没有接他的烟。阿根师傅自己摸出一包纸烟抽了一支，开口说：“老板，你有啥事就说吧，我们还得干活去呢！”

傅老板见没人抽他的烟，尴尬地缩回手，干咳了两声，说：“今天请诸位来是想商量一件事情。大家都知道，这几天的风声很紧，百老汇路要运伤兵，戒严得很紧，我看你们每天这样来上班也确实很危险。再说这兵荒马乱的年头，也没什么工程好做。说老实话，我的底子也很薄，撑不了这个门面。我给你们三个月的工资，暂时回家过一时。等风声松一点，有了生意，我决不会忘记你们这些老伙计的。诸位看怎么样？”说着又从皮包里拿出了一叠钞票和字据，要阿根师傅他们签字拿钱回家。

阿根师傅说：“老板，外面包不到工作，码头上的工作不是还很多吗？”

傅老板有点不耐烦地说：“这些码头工程也马上就不做了，英国大班要回国去了。”

成德说：“这个钱我们不拿，我们不能接受遣散。”其他几位工友也纷纷说不愿遣散，都不肯签字拿钱。

傅老板一见这情形，就凶相毕露地说：“不行，这营造厂是我开的，我说遣散就遣散！我也没有这么多闲饭供养你们，快识相点，拿三个月工资回去吧！”

成德和阿根师傅他们坚决不肯签字拿钱。成德对大家说：“我们还是去干活吧！”说着就要往外走，大家也都跟着站了起来。

这时，傅老板那个“包打听”的三弟跳了起来，把手枪往桌

上一拍说：“不许走！我告诉你们，这两天外面到处在捉共产党，你们不要不识相，敬酒不吃吃罚酒，快点签字拿钱回家，否则别怪我不客气，把你们都抓到警察局里去，当共产党查办！”

他话音刚落，突然外面传来一片喊声：“你有种就把我们都抓去坐班房！”

“不要再逞凶了，你们的日子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啦！”

“我们坚决不答应遣散！”

傅老板闻声大吃一惊，朝外头一看，原来不知什么时候，工地上的工人们都已站在门口了，几十双眼睛都愤怒地盯着他，吓得傅老板的腿也有点发抖了。他三弟一见势头不好，恐怕真动起武来吃亏，想走又下不了台，于是他装腔作势地说道：“好，好，你们等着瞧吧。”说完就收起手枪，拉着傅老板，头也不回地溜走了。

继续革命不停步

东方红，太阳升。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了。

当成德和阿根师傅等工友们上班的时候，迎接他们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代表。拿枪的大手和做工的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成德激动得热泪盈眶。

“工人同志们，上海解放了！从今天起，我们工人就是工地的主人了，……”胡成德听着军代表宏亮的声音，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他想起了哥哥、姐姐的遭遇，想起了孤儿院的非人生活，想起了老板的狰狞面目，想起了工友长生的惨死……，他深深地懂得“主人”意味着什么。

一九五二年，轰轰烈烈的“五反”运动开始了，成德和工友们积极地投入了运动。

有一天，成德突然收到了一张大红请帖，觉得好生奇怪。拆开一看，原来是傅老板寄来的，要他到“五芳斋”饭店去赴宴。成德心想，傅老板怎么会请我赴宴？于是，就带着请帖去找阿根师傅商量。到了阿根师傅家，成德把请帖往桌上一放，说了声：“阿根师傅你看！”谁知阿根师傅并不去看，却笑嘻嘻地说：“有啥看头，我也有的！”说着，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张同样的请帖。没多久，又来了三位工友，也都拿着一样的请帖。

“我们去不去呢？”几位工友问道。

成德说：“依我看就去！看看这老狐狸耍点啥花招！”

阿根师傅也说：“对！我们应该去，我们有共产党撑腰，他敢耍花招我们就和他斗！”

原来，自“五反”运动开始后，傅老板心怀鬼胎，他知道这几个工人最了解他的底细，深怕他们揭发了自己的老底，以后就只好办了，于是就想了这一个计策，妄图用美酒佳肴来封住他们的嘴巴。

晚上，阿根师傅和成德及几位工友来到“五芳斋”，老远就看见傅老板贼头贼脑地在门口等候着。傅老板看见成德和阿根师傅们来了，就满脸堆下笑来，连声招呼着：“失迎，失迎，里面坐，里面坐。”傅老板把成德和阿根师傅他们五人让进里面坐下，给各人面前都斟上满满的一杯酒，谄笑着说：“今天请各位来聚聚，真是失敬得很，先请诸位干一杯！”

阿根师傅看了看满桌的菜，笑了一笑，把面前的酒杯推到一边说：“今天傅老板破费这么多钱钞办酒席，把我们几个穷工人请来，不知有何贵干？”

傅老板一开头就碰了个软钉子，非常难堪，脸上的肉也抖了两抖，又不好发作，只得强作笑脸，再次拿起酒杯说：“来来，有话等会儿再说，先干上一杯！”

成德这时坐不住了，正色地对傅老板说道：“老板，我们工人都是直来直去的惯了，你有啥话就直说吧！”傅老板一见这情势，只得说道：“也没啥大事，就是兄弟脾气不大好，平时说话有得罪诸位师傅的地方，还望诸位看在多年交往的份上，多多包涵，包涵。噢，听说你们手头蛮紧，这里是点小意思，你们先拿去用吧。今后有啥困难尽管来找我好了，我一定尽力而为！”说着，从皮包里拿出了五包红纸包，放在桌上。

大家早已听得不耐烦了，现在又见傅老板拿出钱来，无不感到这是莫大的侮辱！成德气得涨红了脸，“腾”地站了起来说：“傅老板！告诉你，你妄想用这几个臭钱来收买我们工人的心，那是白日做梦！你不要看错了人头吃错了药，钞票买不动我们的心，把它收起来吧！”说完就和阿根师傅等几位工友一起昂首阔步地走出了“五芳斋”饭店。

不久，揭发、批判不法资本家的大会召开了。“打倒不法资本家！”“打倒洋奴走狗！”的口号声，响彻整个会场。

工人们群情激愤，一个接一个地控诉揭发傅老板的罪行。傅老板象只癞皮狗一样，低头站在台前。一个工人揭发傅老板在日本鬼子投降时，把码头上日寇遗留下来的二百多立方米木料、二百多条军毡、三十多吨铁板和仓库里两只银箱里的钱财等敌产，都私自吞没了。另一个工人揭发傅老板解放前勾结英国大班和国民党反动派，凶狠镇压工人的罪行。还有不少工人揭发了他解放以后又大量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偷税漏税，偷工减料，行贿，盗窃国家资财等五毒罪行。

工人们义愤填膺，纷纷责问傅老板：“你非法所得究竟有多少？你坦白！”傅老板抖抖索索地回答：“我……我已经交代了，共是十三亿元（折合人民币十三万元）。”

“你还有什么要坦白交代的？”

“没……没有了。”

“胡说！”胡成德听到这里再也忍不住了，就一个箭步跳上台去。傅老板抬头一看是他，顿时面如死灰，冷汗也冒了出来。胡成德激动地说：“同志们！傅老板不老实，他私吞敌产，克扣工资，偷工减料，剥削了大量的钱财；他放纵工头谋害工友，又故意不给医治，结果被害工友活活痛死；他扣了工人的工资，拿去勾结反动军官搞投机倒把；临解放时，他抽逃资金，把大量钱财兑成黄金，运到国外，他……”

“打倒反动资本家！”“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台下的人们纷纷喊起了口号。这时大会负责同志站起来说：“同志们，根据群众揭发的大量材料，经过调查核实，解放前这个家伙是个罪恶累累的洋奴走狗，解放后又是个五毒俱全的不法资本家。现在宣布：依法逮捕，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话音刚落，两个公安人员，把这个坏蛋手铐一上，押了下去。全场欢声雷动。

旧社会，胡成德和广大工友们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为了生存，屡次起来同老板作斗争，但哪一次斗争的结果都没有彻底改变受剥削、受压迫的悲惨命运。如今，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这个反动资本家才得到了应得的下场。胡成德想着这一切，心里多么高兴啊，他决心要为捍卫红色政权奋斗终生！

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胡成德遵照毛主席关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教导，造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之后，他又按照党的指示，阶级的

委托,进驻上层建筑,领导斗、批、改,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如今,胡成德师傅虽然已两鬓斑白,但他眼睛更亮,斗志更旺。他努力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的重要论述。他说:“我们要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就是不准傅老板那样的资本家重新剥削我们、压迫我们,不准新老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派骑到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我们工人阶级只有跟着毛主席、共产党,牢记党的基本路线,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同一切反动派作坚决斗争,才能保卫我们无产阶级的红色江山永不改变颜色!”

上海市第八建筑工程公司工会写作组整理

满腔怒火压不住

——上海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张雪江的家史

在革命和生产一片胜利的捷报声中，迎来了又一个国庆节。

这一天，上海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举行联欢大会，热烈庆祝祖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张雪江和机关工作人员一起，热情招待着应邀前来参加联欢会的人民解放军、退休工人和基层工程队的工人。人群中，一位白发苍苍、年近七十的老人，注视着张雪江，点头微笑，欲言又止。由于张雪江忙着招待同志们入座，对这位老人的表情没有十分在意。

联欢大会一结束，张雪江走到台前，做清洁工作。忽然，那位老人走到他的面前：

“同志，你认识我吗？”

张雪江凝视片刻，微笑着摇摇头说：“老师傅，我记不得了。”

“你姓啥？”

“我姓张，叫张雪江。”

“哪里人？”

“南汇县瓦屑公社。”

“你父亲是不是叫张春生？”

“是的。老师傅，你认识我父亲？”

“雪江啊，我不但认识你父亲，也早已认识你了！那已是二十、三十年前的事了。刚才进场的时候，看看你面孔很象，一时又想不起你的名字。”

“噢。那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呢？”

“我问你，你父亲是怎么死的？”

张雪江一听，禁不住悲愤交加：“是在一九四六年上海泥木工人大会罢工时被反动派枪杀的。”

“那时全市泥木工为你父亲出丧的情景还记得吧？”

“老师傅，这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出丧那天抱你上马车的那个人还记得吗？”

“不记得了。老师傅，是你？”

“对了。你那时还只有十三四岁，现在四十儿了？”

“四十三岁了。老师傅，你姓——”

“我姓钱。前几年退休了，党和同志们关心得很哪，按月发给退休工资，每逢节日还请我参加联欢会。真是托共产党、毛主席的福啊！”老人爽朗地笑了，笑得那么欢快，那么幸福。

“钱师傅，你说得很对。没有共产党、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祖国今天的繁荣富强，也就没有我们劳动人民今天的幸福生活啊！”

“当年你父亲和工人们一起参加罢工斗争，流血牺牲，就是为了盼望能有劳动人民翻身解放的日子。我们可不能忘掉他们啊！”

钱师傅的一席话，勾起了他们的思绪，旧社会辛酸的往事

又一幕幕地涌现在眼前……

张雪江出生在南汇县瓦屑村的一个泥工家庭。家无田地，靠父亲张春生在上海做泥水匠和母亲替人家缝缝补补、打短工过日子。尽管父母辛勤地劳动，还是不能养家活口。所以，早年守寡的雪江祖母，也只得到镇上财主家做佣人，勉强糊口。从雪江懂事时起，“糠麸野菜南瓜汤，锅里碗里水汪汪”，便是一家人的主粮。母亲总是安慰雪江：“等阿爸拿钱回来买米！”可是盼呀盼呀，盼回来的阿爸，不是卖掉了衣衫，就是典当掉被头。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进占上海后，工厂关门，百业萧条。张春生找不到工作，只好在家里呆着。

一九四五年九月，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传到了瓦屑村。张春生满怀希望地到上海去找工作，他想，日本鬼子投降了，手艺人总该有点活路了。可是，当张春生一到上海，耳闻目睹美国兵在马路上横冲直撞，国民党“劫(接)收大员”到处敲诈勒索，顿时使他对抗战胜利的喜悦心情冷了半截。

开头，张春生在一个月里还能有半个月或二十天生活做。可是，只半年左右的时间，胜利后的虚假繁荣，就象五彩缤纷的肥皂泡那样，随风破灭。建筑行业也随着萧条起来，建筑工人又找不到工作做了。

随着蒋匪帮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滥发纸币，物价见风而涨。日寇投降时，米价每石三千八百元伪币，到了一九四六年三月初，便涨到每石三万元伪币。而当时泥水木匠的日工资只有约一千元伪币，使广大泥水木工的生活更加窘困。张春生对抗战胜利后所抱的幻想，这时彻底地破灭了！

一九四六年三月初的一天上午，在饥饿逼迫下，张春生只得把一件棉袄送进了当铺。他从当铺里出来，照例走进徐家

堂一家茶馆去等候招工。同行倪师傅看到春生身上只穿件破夹袄，冻得嘴唇发紫，就倒了一杯热茶，关心地说：“张师傅，吃杯热茶暖暖肚子。你可要注意身体啊！”

张春生感激地点了点头，满腔愤恨地说：“现在物价飞涨，苦的是我侬做一天吃一天的工人！”又接着说，“现在是没有生活做要饿死，有了生活做也要饿死。一天的工钱只能买几只大饼，再照这股风涨下去，说不定过几天只好买几张草纸了。……”

张春生的话还没说完，茶馆里的堂倌师傅站在店堂中间叫开了：“各位老茶客，米价又涨了，老板吩咐，茶钿从明天起按旧加三，往后随米价起落。拖欠的请在今朝算清，明天起，一律按新价结算。请各位老茶客包涵。”

“你们听听！”张春生没好气地说，“茶馆老板也在涨风里凑热闹。这也涨，那也涨，叫我们工人怎么活下去。我们也要涨工钱！”

“涨工钱！这是个办法。”

“对！只有涨工钱！”

“物价涨，工钱低，受苦的不光光是我们泥木工人，全上海的工人不都是一样？我有个亲戚在纺织厂里做，前几天他们也提出涨工钱，老板不答应，工人抱齐了心罢工，坚持了五天，听说昨天老板乖乖地答应了。老板是蜡烛，不点不亮的！”倪师傅头头是道地说。

张春生听了兴奋地说：“我们也罢工！一面罢工，一面同老板交涉涨工钱，不怕老板不答应。”

“好是好，就是光靠我们十几个人罢工还不行。”倪师傅喝了口茶说，“要到虹口、沪西、南市的几只茶馆里去跑跑，大家

约齐了，要干就一起干。我看，罢工不仅是为了涨工钱，还要通过罢工，把全市的泥木工联合起来抱成团，以后就能和老板斗。大家说对不对？”

大家都一致同意。最后公推在群众中很有威信的倪师傅和热心公益的张春生两人，到泥木工集中的几个主要茶馆去联络。

倪师傅说：“现在大家还是照样寻生活做，等我们出去约齐了罢工的日子，再告诉大家。”

三月七日上午，张春生来到一个工地上，对工人们说：“虹口、沪中地区的老师傅们今天已经罢工了。我们也罢工，到硝皮弄‘鲁班殿’去集中。”

工地上的泥木工们听了张春生的一席话，都收起工具，成群结队地向南市硝皮弄涌去，参加罢工斗争。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这些群众，因为挨饿，因为政治上受压迫，因为蒋介石的反人民的内战夺去了人民的一切活路，他们就不断地掀起了反对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政府的斗争，他们的基本口号是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和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在这一股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革命洪流中，震撼蒋家王朝的上海三万泥木工人大罢工，于一九四六年三月七日开始了。

“鲁班殿”设在南市城隍庙旁边硝皮弄一百零五号。当张春生和几十个泥木工来到“鲁班殿”时，里面已经挤满了工人。在正殿前面的大天井内外，坐着的，站着的足有千把人，他们正在议论着建筑工人的悲惨生活，痛斥着黄色工会出卖工人利益的卑鄙行径。忽然，一个头戴呢帽的包工头模样的人爬上台，带着嘶哑的声音叫唤起来：

“老师傅！静一静，兄弟有几句话同大家说。”他等大家静下来，清了清喉咙继续说：“大家要加工钿，可以和营造厂同业公会去谈，罢工不可以。罢工，老板有损失，我们工人也有损失……”

“工贼！”

“奸细！”

“老板的走狗！”

罢工的工人们见这家伙竟敢公开破坏罢工，更加激愤，整个天井喧闹沸腾起来了。张春生和一个工人跳上台去，一个反剪了他的双手，逼他跪了下来；一个揪住了他的耳朵厉声责问：“快说，老板给了你多少钱？”

那家伙被揪得“喔唷喔唷”直叫，只得求饶道：“请抬抬手，我说，我说。”

在愤怒的工人们的威逼下，这家伙不得不坦白交代：他是虹口地区的一个包工头。营造厂老板给了他五万元伪币的“香烟”钱，要他混进“鲁班殿”来劝说工人们不要罢工，事成之后再重重赏他。

工人们一听，肺都气炸了。张春生说：“我们要抱成一个团，斗倒老板。”在广大工人的要求下，倪师傅召集了各地区的罢工代表，经过协商，成立了罢工指挥部。随后，指挥部决定分派两批工人出去。一批到各工地上去进行宣传，扩大罢工队伍；另一批作为工人代表到伪市社会局去请愿，提出日工资从一千元伪币增加到四千元伪币的要求，如米价继续上涨，工资也要随着提高。

到了下午，忽然天井里又喧闹起来，一个工人挤进办公室来说：“逮住一只黑毛猪”（指当时伪警察穿的黑色制服）。张春

生跟着倪师傅等跑到天井里一看，只见一个肥头胖耳的伪警察，他一反其平时的八面威风，颤颤栗栗地说：“弟兄们，别……别误会……别误会。”

原来，国民党反动派对泥木工人的罢工运动恨得要命，怕得要死，采取了镇压措施。当二、三百个工人成群结队地到南市工地上去宣传罢工时，伪邑庙、蓬莱警察分局派出警备车尾随弹压，蛮横干涉，当场抓走两个工人，押进了伪警察局邑庙分局。这批工人在回来的路上，经过城隍庙，这个胖警察又上来干涉，诬蔑工人罢工是“捣乱”。工人们一气之下，把这个伪警察扭到了“鲁班殿”。

工人们听说有两个工人被捉进了伪警察局，犹似愤怒的火焰上浇了一桶油，更加怒不可遏。

一个工人说：“要用这个警察换回我们两个工人，大家看好不好？”

“好！”

“对！不把我们两个工人放回来，这警察也休想走。”

几百个工人异口同声地表示同意。

罢工代表简单地商量了一下，决定接受工人们的要求。立即派出二百多工人到伪邑庙警察分局去示威，进行交涉。

过了一会儿，二百多工人和被扣的两个工人，兴高采烈地回来了。他们同伪邑庙警察分局经过了一场斗争以后，对方被迫接受了工人的条件，把被扣的工人放了出来。

这一战斗的胜利，更加鼓舞了工人们的斗志。大家决心把罢工斗争进行到底。

可是，伪市社会局和营造厂同业公会的老板狼狈为奸，他们自以为有国民党反动派撑腰，有恃无恐，迟迟不接受工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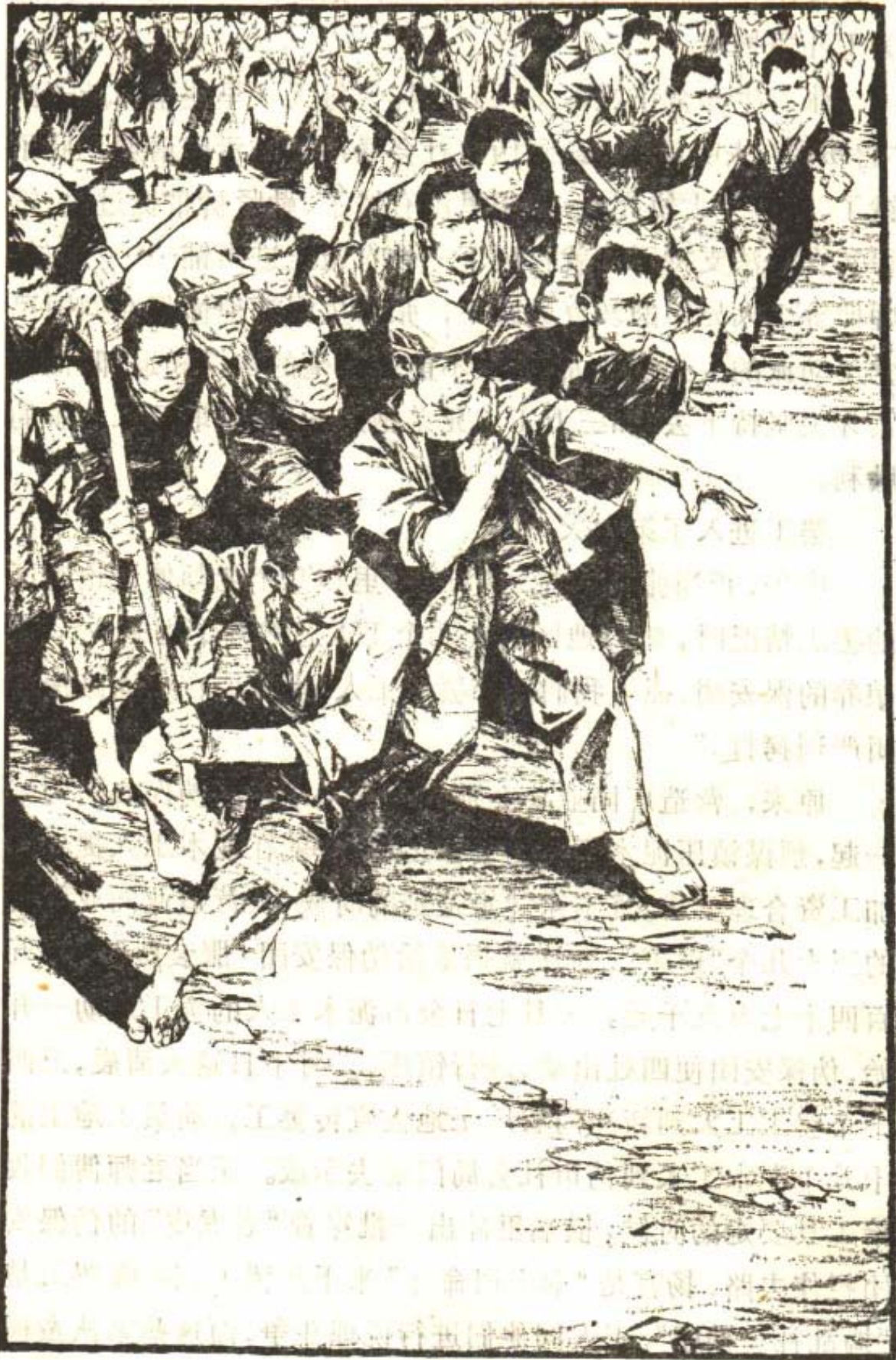
合理要求。他们采取拖延政策，企图把上海三万泥木工人的罢工斗争拖垮。

张春生和全市泥木工人们一样，每天一早便空着肚子到“鲁班殿”去听消息，或到伪市社会局门口去示威请愿。肚子饿了，买一个大饼充饥；口袋里没有钱了，勒紧裤带挺过去；饿得实在无法支持了，就再脱下一件衣服送进当铺……。在德师傅等工人兄弟的教育鼓励下，张春生深深地懂得在同国民党反动派的生死搏斗面前，决不能有丝毫的怯懦和退却，他咬紧牙关坚持下去，和三万工人兄弟抱成一团，争取罢工斗争的胜利。

罢工进入了第四天。

中午，正当张春生在“鲁班殿”里和几个老师傅谈论各区的罢工情况时，虹口地区的十几个工人忽然奔了进来说：“狗娘养的保安团，抓了我们两个罢工工人，现在关在乍浦路保安团严刑拷打。”

原来，营造厂同业公会那些资本家早已和伪保安团勾结一起，预谋镇压泥木工人的罢工运动了。就在泥木工人提出增加工资合理要求，资本家肆意拖延的时候，仅营造业同业公会的三十几个“理事”，一次就捐款给伪保安团“服装费”伪币五百四十七万五千元。三月七日全市泥木工人的罢工运动一开始，伪保安团便四处出动，进行镇压。三月十日这天清晨，三四十个罢工工人到新光内衣厂工地去宣传罢工，动员工地上的十几个泥木工人到伪市社会局门前去示威。正当老师傅们收拾工具要走的时候，横端里冲出一批穿着“老虎皮”的伪保安团拦住去路，扬言是“奉上司命令”来干涉罢工，诬蔑罢工是“捣乱社会秩序”。工人同他们进行说理斗争，而这些家伙蛮横



无理，伸手就打。工人们被激怒了，纷纷涌上前去。这批家伙见工人多，便狼狈逃窜了。当工人们走到汉阳路公安里附近时，荷枪实弹的伪保安团追了上来，当场抓走了泥工沈栋梁，押进了乍浦路伪保安团沪北区第一大队第一中队队部。同乡工人朱林根前去探望，要求释放沈栋梁。伪保安团蛮不讲理，又将朱林根抓了进去。

工人们听到伪保安团非法逮捕罢工工人，气愤极了。张春生愤怒地高喊：“我们到乍浦路要人去！”

“对！不放出人，我们誓不罢休！”工人们都支持张春生的提议。

各区罢工代表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支持大家的意见，派五百人到乍浦路伪保安团门口去示威，要回被扣的工人。

张春生、倪师傅、李师傅和几个木工走在示威队伍的前面，雄赳赳气昂昂地冲过停在硝皮弄口监视罢工的伪警察局警备车，向乍浦路进发。一路上，沪中、虹口一带的泥木工人们又参加进来，走到乍浦路，已形成了一千多人的队伍。

下午四时，示威队伍到达目的地，整个一条乍浦路，被愤怒的泥木工人占领了。

伪保安团一中队队部驻在乍浦路海宁路口的一幢大楼里。一批伪保安团员荷枪实弹，已经排列门口，如临大敌。

张春生先走上前去交涉：“你们为什么逮捕我们罢工工人？我们全市三万泥木工人，要求你们立即把工人沈栋梁、朱林根放出来！”

伪保安团值日副官强词夺理地说：“他们殴打我们团员，就要逮捕。”

工人理直气壮地反驳说：“是你们先打人，工人出于自卫。

你们保安团无权抓人！”

伪副官被驳得目瞪口呆，兽性发作，返回里间，搬出了一挺轻机枪架在门口，威胁工人们：“退不退？！”伪保安团其他几个团员也端起步枪推弹上膛，对着手无寸铁的示威工人。

愤怒的工人们哪容得伪保安团如此凶横！

张春生等寸步不让，浩气凛然，高喊着：“进去要人哪！”步步向伪保安团门口进逼。

国民党反动派终于下毒手了！

伪保安团团员在上司的密令授意下，打了一枪，但是工人们没有被吓倒，他们推倒了岗亭，继续向门口冲去。

这时，有一个伪保安团员退到楼梯边上，从横端里又开了一枪。子弹穿过张春生的太阳穴，又射进了并肩前进的小朱的胸部。饱尝旧社会苦难的三十九岁的张春生和刚满师不久年仅十九岁的小朱倒在血泊里了。他们为了工人阶级求解放的正义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伪保安团情知不妙，为了掩盖和抵赖罪行，慌慌张张地把打得遍体鳞伤的工人沈栋梁、朱林根从后门放了出来，把杀人凶手藏了起来，杀人帮凶以及一批伪保安团员也随即携枪从后门逃了出去。

蒋匪帮的血腥镇压没有吓倒罢工工人，示威队伍象潮水般地涌进了伪保安团，占领了大楼。倪师傅指挥工人们组织了纠察队，保护好现场，叫来了照相馆里的摄影师，拍摄了两位工人倒在血泊里的现场，留下了蒋匪帮的罪证。

两位工人的牺牲，更加激起了罢工工人人们的满腔愤恨，除了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并提出了“严惩杀人凶手！”“不许镇压罢工！”等口号，罢工斗争从经济斗争转入政治斗争。

当时，负责处理罢工运动的伪市社会局，本来还假充“中间人”，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调停”，如今蒋匪帮枪杀了两名工人，他们的假面具被撕去了，立即成了被告当事人。三月十一日，上万名泥木工人从全市的四面八方“鲁班殿”集中，殿内容纳不下，就排列在硝皮弄、城隍庙。国民党伪警察局又派出警备车进行弹压，但看到人群如潮水般地涌来，不敢动手。罢工队伍向林森路（现淮海中路）进发，到伪市社会局去示威。沿途呼喊口号，张贴标语，进行示威游行。那几天正值下雨，但阻挡不了怒火填胸的罢工工人。一连三、四天，林森路、马当路和伪市社会局内广场上，示威的泥木工队伍昼夜不散。工人们愤怒地说：“一天不答应我们的要求，队伍就一天不散。”全市的工人群众纷纷声援，林森路一些商店的店员还集资购买了面包，支援示威工人。

消息传到重庆，躲在峨眉山上策划反共反人民内战的匪首蒋介石慌了手脚，怕枪杀工人事件引起全上海人民的反抗斗争，影响他发动反共反人民内战的部署。从三月十四日下午三点四十分到三月十五日上午十一点半，这不到一天的时间里，连拍了三个加急电报给伪上海市市长钱大钧讯问情况，授以机宜。先是以伪军事委员会的名义要钱匪“迅即核办”；接着是匪首蒋介石亲自具名，要钱匪“防激起众愤，希速彻查真相具报为要”；特务头子谷正纲也赶忙出面，要钱匪“妥善处理，毋使事态扩大，……并于重大事件发生后随时电告为荷”。

钱匪大钧心领神会，便采取了反革命两手政策。他一面指使伪市社会局局长吴开先答应工人增加工资，从三月十六日起，泥木工日工资从一千元伪币增加到四千元伪币，欺骗工人撤掉在伪市社会局门口的示威队伍；另一方面，又派特务混进

了工人队伍，监视罢工积极分子，准备逮捕镇压；还指使反动报社进行造谣宣传，企图利用反革命舆论吓唬工人。在枪杀案发生的那两天，《新闻报》、《申报》的报道还不得不承认“保安团枪杀工人两名”，可是到了十五日以后各报登载伪《中央社》的消息，却用反咬一口的卑鄙手段掩饰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胡说什么杀人凶手是“为自卫起见，向天鸣枪示威，不料在扳机时群众一拥而前，企图夺枪致流弹发生不幸事件”。

工人们看到伪《中央社》的造谣宣传，气愤极了，在“鲁班殿”里议论纷纷：

“明明是保安团枪杀工人，报纸反说我们工人夺枪，要赖账办不到！”

“我们为死难兄弟出丧，向这些反动家伙示威！一定要显示出我们工人团结起来的力量。”

“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宣传枪杀事件的真相，争取社会各界的同情。反动当局不是说‘流弹致死’吗？我们针锋相对组织出丧，在马路上一宣传，他们的谎话就拆穿了。”

“经费怎么办？”有的工人担心地问。

倪师傅说：“到社会上去募捐。通过募捐，既可以宣传枪杀事件的真相，又解决了我们的经费困难。”

就这样，工人师傅们把这次为死难兄弟出丧，变成了同那些乌龟王八蛋作斗争的一种手段。

出丧那天，全市送葬的泥木工人有二万多人。死难家属坐在马车上，由七、八队“军乐队”开路，向国民党反动派示威。每遇“路祭”，工人们便就地控诉反动派枪杀工人的罪行，高呼“严惩凶手！”“不许镇压罢工！”等口号。游行队伍行经乍浦路，吓得伪保安团赶忙紧闭大门，龟缩屋内。虽然国民党反动派

还时时捣乱,出动军用卡车,要拦腰通过,企图冲垮送葬队伍,但是工人们手挽着手,寸步不让,中断交通。一路有轨电车停驶,从外滩一直排到大新公司(现市第一百货商店)。送葬队伍走了七、八个小时。

全市泥木工人运用出丧的形式,用事实揭穿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宣传,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同情,“严惩凶手”的呼声更高了。

在泥木工坚持斗争的压力下,在其他行业劳动人民的声援下,纸再也包不住火了。一九四六年四月,伪淞沪警备司令部不得不开庭,审讯杀人凶手。

在十几位工人的陪同下,张雪江和母亲走进了伪军事法庭,同国民党反动派开展一场面对面的斗争。

旁听席上,坐满了国民党反动派请来的营造厂资本家们。被告席上,杀人凶手散手散脚,悠闲自在。而倪师傅等十几个工人陪着死难家属进去,却受到蒋匪军的百般刁难,一忽儿要检查他们的“身份证”,一忽儿又说只能进去两个人。工人们据理力争,虽然进去了五、六个,但蒋匪军却横着上了刺刀的枪不离左右。

一开庭,果然不出工人们所料,凶手、伪检察官、辩护律师都是和伪《中央社》同一个口径。凶手一口咬定:“工人夺枪,我鸣枪自卫。”伪检察官也胡说:“流弹误伤。”辩护律师又摇头晃脑地说:“以不得已之手段开枪示威,尚难谓为不当,应从轻论处。”这一套事先编排好了为国民党反动派开脱罪责的把戏,气得张雪江母亲跳了起来,冲上去要打凶手的耳光,但被端着刺刀的蒋匪军粗暴地推开了。倪师傅作为代表,站到了原告席上。

伪法官气势汹汹地问：“你们工人为什么夺枪？”

“夺枪？这是无中生有。在场一千多工人都可以证明。”老倪从容地回答。

伪法官一时语塞，老鼠眼骨碌碌地转了几转，又凶狠地说：“工人聚众闹事，扰乱军事重地，以致造成了不幸事件。是这样吗？”

倪师傅镇定地说：“物价飞涨，工资低微，泥木工人在饿肚子，生活没有保障，才向政府请愿增加工资，完全合理；而保安团非法拘捕工人，严刑拷打，我们工人赤手空拳去要求释放被扣人员，他们却下毒手枪杀工人。我们三万泥木工人和社会各界民众，早就提出要求，要求政府严惩凶手。现在法官反说我们工人‘聚众闹事’，这不是黑白不分，颠倒是非么？！”

工人的控告铁证如山，工人的回答坚强有力。伪法官慌了，连忙同在座的伪检察官咬了一阵耳朵。

在工人们坚决斗争下，反动派慑于群愤，怕再引起罢工风潮，被迫判处凶手有期徒刑十五年。但是，这是国民党故作姿态，掩人耳目。其实，杀人凶手根本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还是让他逍遥法外。

解放后，一九五一年镇反运动开始不久，张春生的徒弟阿福特地从上海赶到南汇乡下，报告喜讯。他拉着雪江的手，兴高采烈地对雪江母亲说：

“阿妈，真是大喜事，杀害师傅的凶手已经被人民政府捉起来，严厉惩办了！我还参加了审判杀人凶手的公审大会。上海市人民法院当场宣判的，真是大快人心！”

.....

节日之夜的灯火亮了，照得满天通红，灿烂辉煌。张雪江

和钱师傅还在继续谈着。

“现在你一家人好吗？”钱师傅关切地问。

“祖母活到七十八岁高龄，已去世，母亲现在过着丰衣足食的晚年生活，我一九五四年就成了家。看看今天，想想旧社会，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劳动人民哪一家没有旧社会的血泪账，新社会的幸福史。可是刘少奇、林彪一伙叛徒、卖国贼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要硬拉我们退回到旧社会去，要让国民党反动派枪杀你父亲那样的血案重演，要我们劳动人民吃二遍苦。雪江，我们要同这些家伙斗争到底啊！”

这时，街头扩音器里，正传来国庆之夜的嘹亮歌声：“看现在呀想从前，不忆苦哇不知甜。被压迫人民求解放，毛主席领导咱们把身翻。前辈流血汗，战斗几十年，建立了社会主义好江山，好江山。看现在来想从前，仇和恨，记心间。枪杆握得紧又紧，保卫红色江山。艰苦奋斗，发愤图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继续革命，永远向前！……”

这歌声，表达了钱师傅和张雪江的心愿；表达了千千万万劳动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红色江山的决心和信心。

上海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工人业余写作组整理

油漆工人绘新图

——上海市第七建筑工程公司工人童传根的家史

同志，你到过闵行一条街吗？那一幢幢淡黄色的工人新村，在绿荫掩映下，显示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这鲜艳的色彩，象征着祖国的繁荣富强，象征着工人阶级热情奔放的精神面貌。这墙粉颜色就是由上海市第七建筑工程公司老油漆工童传根师傅设计的。

童师傅今年六十岁，共产党员。他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加上他那丰富的油漆经验，二十多年来，他用那把油漆刷子，曾为祖国的社会主义江山不断增添着绮丽色彩！可是回顾那暗无天日的旧社会，在童师傅的这把油漆刷子上，却是斑斑血泪呀！

一九二七年冬天，山风在浙江鄞县山区童村呼啸。十三岁的童传根，就背着一条破棉絮，夹着一个包了几件破布衫的包袱，跟着他的娘舅到上海去学漆匠了。

阿爸、阿妈把他送到村口。“叫你小小年纪去吃苦学生意，真有点不放心。实在是山里养不活你，象你阿弟……。”阿妈说到这里，眼泪簌簌地淌下来，再也讲不下去了。

阿爸、阿妈租种地主的几亩薄地，艰难地度着日子。这年正是灾荒，野菜粗粮也吃不上，六岁的弟弟因连饿带病，又无

钱医治，死了。与其在山里饿死，还不如到外面去寻一条生路。阿爸东托西求，好不容易，请荣根娘舅在上海“利祥”油漆店为传根找到了一门学徒生意。

阿爸一边劝慰着阿妈，一边对传根说：“你去好好学手艺，熬过三年萝卜干饭，有了手艺，我们这些受苦的穷人，说不定有个出头日子。”懂事的童传根强打起笑容说：“阿爸、阿妈放心吧，我满师以后寄钱回家，日子会好起来的。”

十三岁的童传根哪里知道，这“三年萝卜干饭”，是多么不容易呵！

非人的生活不断地折磨着童传根。繁重的家务只管往小小的童传根身上压。每天天不亮他就得起身，倒好马桶又要去买菜。老板娘又那么刁，每次买菜回来，她总要用她的那杆小秤称过，还要看看童传根的嘴，有没有留下什么食物残屑，深怕学徒“揩油”小菜钱去买零食吃。生长在山村的童传根，没有念过书，有时把菜的价钱报得慢了一点，老板娘就象恶狼似地扑来，用鸡毛掸帚乱打乱抽。在童传根身上留下了条条血痕啊！

吃过早饭，童传根又得去忙十几个老师傅的饭菜，三九严寒，在冰冷的水里洗菜犹如刀割手指，也得硬着头皮做。他忙东忙西地侍候老板、老板娘他们吃好中饭，挺在床上睡午觉了，自己还不能直直腰，喘喘气。后院还有几百斤石灰块等他去化。

有一天夜晚，传根刚吃好老板一家吃剩下来的残羹冷饭，正打算收拾碗盏，老板对传根说：“从今天起，每天晚上一锅胶水要你烧，第二天要派用场的。不烧好，当心吃生活！”说着，就出门去了。

传根洗好碗，又服侍好老板娘，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胶水灶头很高，传根身子够不着，就在灶前垫上一只木箱，一边往灶肚里塞柴片，一边站在木箱上拿起和他差不多高的铲刀，不停地翻动，防止胶水搭底烧焦。胶水在锅里翻滚，不一会传根被难住了：胶水烧到怎样的稠度才算好呢？老板只叫烧胶水，却不交代怎么烧。传根为难地看看灶头旁边卷缩在破棉絮里呼呼打鼾的阿六师兄，心想问问他吧。传根压低了声音叫着：“阿六！阿六！”可是，只比传根大两岁的阿六，经过一天的劳累，正是好睡的时候，怎么也叫不醒。传根看看锅里翻滚的胶水，急得头上冒出了汗，不得不大声叫喊着阿六。喊声惊醒了睡在二楼的老板娘。她用破锣似的嗓门骂开了：“叫什么魂！你身上又在发痒了……”正在这时，喝得醉醺醺的老板推门进来了。老板娘听见男人回来，更加撒起泼来：“你请了个小赤佬来，生活不会做，还吵得全家六神不安，今天又不让我困安稳觉，不教训教训他，明天就要爬到我头上来了！”老板不问青红皂白，顺手拿起桌上的一把铜尺，劈头盖脑地向传根打来，直到手打酸了，才把铜尺一丢，吼着：“胶水烧焦了要你的命！”说罢，他上楼睡觉去了。阿六师兄已经醒来，爬起来帮传根烧好胶水。等师兄俩钻进破棉絮里，店堂里的时钟已经敲十二下了。

传根抚摸着条条伤痕，翻来复去地睡不着。一年来的挨打受骂、非人的学徒生活，又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他想到那老板、老板娘的狰狞面目，真恨不得放上一把火，把他们活活烧死。可是，阿爸的话又回旋在耳边：“熬过三年萝卜干饭，有了手艺，说不定有个出头日子。”可这日子怎么熬啊！

在老板、老板娘的逼迫下，传根忍无可忍，离开了“利祥”

油漆店，回到了乡下。家乡接待童传根的，也只是饥饿。灾荒连年，地主逼租，哪有穷人的活路？十五岁的传根每天跟着阿爸、阿妈上山砍柴。柴有时还卖不出去，怎么办呢？阿爸、阿妈商量着，还是要传根到上海去学生意。动身那天，阿爸对传根说：“你这一次一定要学到手艺！俗语说，荒年饿不死手艺人。”传根望着父母蜡黄的饱经风霜的脸，只得一一应承了。“三年萝卜干饭”是什么滋味，在“利祥”油漆店过了一年多学徒生活的传根已经领略过了，但阿爸说的“荒年饿不死手艺人”这句话，却深深地印入了传根的心里，使他产生了一丝希望。

一九三〇年新春，童传根踏进了上海“仁新祥”油漆店，开始了第二次学徒生活。

童传根十六岁了。老板看着他长得一副好身架，觉得再放在家里当佣人是不合算了，又招来一个师弟代替童传根做家务，支使他上工地干活。每天，天刚朦朦亮，童传根就要把油漆桶和比人高出两倍的竹梯，扛到工地上去。汗水还来不及擦，他又拿起铲刀去铲门上的污物和铁窗的铁锈，然后涂底漆，为老师傅们做准备工作。中午快到了，还要急急忙忙赶到店里去拿饭，再送到工地上。

配料，是油漆店里一门高档的生活。陈师傅是“仁新祥”里掌握这门技术的头块“牌子”，他能把五种油漆调配成几十种绚丽多彩的颜色。传根是多么羡慕、多么希望他传授给自己这门技术啊。陈师傅是一个四十岁刚出头的人，生活的担子已经压得他弯腰曲背，终日吭吭地干咳个不停，还不时地叹着气，似乎有什么深仇大恨郁积在心头。传根好奇地向师兄林根打听陈师傅的情况。林根讲：陈师傅在老板的父亲当家的時候，就到“仁新祥”来学生意了。有一次做高空生活时，

他从三层楼高的空中摔下来，得了吐血病。知道了他的苦难身世，传根更感到陈师傅可敬可亲了。传根走过配料间，象是着了迷似的，站在窗口，看着陈师傅的一举一动。正当他看得出神的时候，被老板撞见了。老板眼珠子一转，鬼主意就来了。“你想学配料吗？”老板装出一副关心的样子说。传根不知他要什么花样，随口“嗯”了一声。老板接着说：“陈师傅是我们店里工钱顶大的一个，但他年纪大了，做不来什么事了。你去缠住他，要他教你学配料，学会了，陈师傅的位置就让给你。嘿嘿！”听到这里，传根明白了老板的阴谋诡计，老板原来是看陈师傅老了，想借刀杀人，利用自己学手艺心切，去把陈师傅的技术抢到手，然后再敲掉陈师傅的饭碗。“不，我决不做这种害人的事！”传根心里想着，一声不响。

一连几天，传根故意躲开了陈师傅。而陈师傅呢？趁着老板外出，老板娘在叉麻将，却主动来打招呼：“传根，这几天你为什么闷闷不乐的？”传根望着陈师傅满布皱纹的脸，不由得一阵心酸：多好的师傅！一场灾难将要临到他身上，可他却关心着别人。传根把老板的阴谋，全部告诉了陈师傅。陈师傅听了气得把牙齿咬得咯咯响，说：“真是狼心狗肺！我为他家两代卖命，他还想出这样一条毒计来害我！”他吭吭地咳了一阵，叹了口气说：“老板有钱有势，我们工人到什么地方去讲理啊！传根，你快满师了，也应当学一门技术了，有点技术总比没有技术强。我这身子过了今天还不知道能不能活到明天，也正想挑一个人传给他这门技术。你既想学，我就教你吧！……”童传根赶快插嘴说：“陈师傅你放心，我们都是工人，你就是教会了我，有你在店里一天，我也决不会用出来！”陈师傅苦笑了一笑，抚摸着传根的头，说：“这样吧，每天趁老板、老板

娘睡午觉的时候，你来！”

不料，隔不多久，陈师傅的吐血病复发，大口大口地吐着血，一个老师傅把他送回家乡去。临走那天，陈师傅颤动着嘴唇对传根说：“我不行了，你今后只能向其他老师傅学了。”传根强忍住泪花，讲了一些安慰的话。过了几天，乡下传来了消息，说陈师傅怀着对旧社会的满腔悲愤死去了。

到了传根将要满师的那一年冬天，老板也支使传根到高空去刷油漆了。一开头就碰上了油漆“字林西报馆”九层楼的水落管工程。严冬腊月，北风呼啸。工地上根本没有什么安全设施，这九层楼的水落管怎么漆呢？老板逼着童传根和林根去做。学徒不做可不行！童传根刚来“仁新祥”就立下了学徒“关书”，“关书”上明文规定：“要听老板的话，不许违抗，否则停生活和赔偿一切费用。”好容易即将熬满“三年萝卜干饭”，要是不做，那就全部落空了。

童传根跟着师兄林根爬上了“字林西报馆”九层楼。抬头望去，破棉絮般的乌云，直向头上压来；向下俯视，那深灰色的水落管，一直爬向地面，真象家乡山区的土灰蛇。两根绳子中间搁着一块木板，这就是漆匠高空作业的唯一设备了。人坐在木板上，好象坐在树叶上随风飘荡。传根在“仁新祥”卖了三年命，身上穿的还是那件阿爸给他的破夹袄和补了又补的两条单裤。刺骨的西北风，直往他袖口、裤脚管里钻，漆着漆着，手脚被冻得麻木了，漆到最下一层楼的水落管时，已经冻得不会动弹了。师兄林根把他从木板上抱下来，在报馆里做杂差的中国人送来一碗热开水，才使童传根渐渐地暖和过来。

那时已经接近旧历年关，老板买好了年货，准备接“财神”招财进宝了。传根心想：过年总可以歇几天了。不料，老板又

对传根和林根说：“刚刚接到一月店家门面油漆生意，马上就去做。这笔生意做好，我们就‘封关’。”传根和林根赶忙去搬竹梯和油漆桶，一看竹梯，不好，有两层踏脚的接头地方已经裂开。传根找来工具，准备修理一下。老板跑来，见到传根他们还没有走，马上虎起面孔咆哮起来：“小赤佬偷懒，到现在还没有走！这笔生意我好不容易抢到手的，人家要求急，年关以前要完工的，才出了大价钱。”传根指着竹梯裂开的地方，说要修理一下才能出工。可是老板不容分说“踏上去当心点不就行了，大惊小怪！”逼着师兄俩马上出工。一路上，传根嘟哝着：“人家油漆店都‘封关’了，我们大小年夜还要去做！”林根也气愤地说：“我们的老板是棺材里伸手，死要钱！”

果然，不幸的事故发生了。当童传根登上竹梯，去铲旧漆的时候，那踏脚裂开的地方断了。他一脚落空，从一层楼高的空中摔下来，昏死过去。林根和那家店里的伙计们闻声赶来，七手八脚地把传根背到避风的地方，灌了一杯热开水，传根才慢慢地苏醒过来。林根扶着童传根一步一拐地回到店里。老板却轻飘飘地说了一句：“漆匠师傅哪个不是七个跟头八个攒的？没有关系，过两天就好了。”说着，就支配其他学徒去顶替传根的生活，丢下传根不管了。

除夕的爆竹震天响。老板一家正在猜拳灌酒吃年夜饭。童传根却卷缩在楼梯旁的“无脚床”上呻吟着。他想：老板一家从来不做生活，却天天大鱼大肉，吃得肥头大耳，这是为什么？……传根翻了一个身，头碰在一个火柴盒子上，拿起一看，盒子里已经剩下不多几根火柴了。那是传根刚进“仁新祥”的头几个月，省下“剃头钱”买的几盒火柴。每天临睡的时候，他就擦一根火柴，来计算那艰难的学徒月日。现在，第十盒火柴已

经快擦完了，说明“三年萝卜干饭”将要熬到头了。“阿爸、阿妈啊，我没有辜负你们的希望，过了年就可以满师了！”童传根怀着对“满师”的一丝希望，进入了一九三三年新春。

过了正月半，童传根忍着腰痛去找老板。“三年到了，我要满师了！”他理直气壮地说。

“满师？好啊！老规矩，办两桌满师酒吧！十元钱一桌。”老板若无其事地说。

“这……”童传根听到二十元钱，为难了。在“仁新祥”做了三年，除了身上穿的破衣裳，身无分文。

老板见把传根难住了，便皮笑肉不笑地说：“拿不出钱吗？好商量，我先给你垫二十元，将来在你工钱里扣好了。还是老规矩，学三年，帮三年，再给我帮工三年。你养伤的日子，也要补三个月工！”

童传根为老板卖命摔伤，歇了半个月，却要补三个月的工，天下那有这种横理！可是传根转念一想，反正可以满师拿工钱了，补三个月就补三个月吧。不料，到了第四个月的月底结账，童传根拿到的工钱却只有六元。为什么老师傅的工钱是十八元，而自己只有六元呢？晚上，传根问林根，这究竟是什么原因。林根说：“这是老板定的规矩。要是你自己拿出钱来请了满师酒，满师以后的工钱是老师傅的一半，九元。要是由老板拿钱出来请的满师酒，只好随他扣，他高兴给你几钿是几钿。”传根一直干到三年帮工结束，却被老板总共扣去了一百零八元的工资。

一九三九年秋天，老板承包了一家银行老板的泡立水家具生意，支配童传根和林根去做。那时，童传根已经成家。一清早，传根替病倒的妻子去等米店开门，买了六谷粉送到家

里，上工的时间到了。他只得空着肚子赶到银行。他漆着漆着，几滴泡立水掉在地板上，他赶忙蹲下去用衣袖擦干净，忽然头上挨了一记打，“咚”地一声，头撞在墙壁上，眼里直冒金星。童传根抬头一看，只见一个身穿西装、手里夹着雪茄烟的家伙，嘴里骂着：“臭漆匠，打蜡地板给你弄坏了！”说罢又扬起手杖，准备再打。童传根愤怒地站了起来，一手抓住手杖，一手伸过去当胸就是一拳。边上几个狗腿子见主人挨打，围上来，把童传根一阵毒打。那穿西装的家伙乱叫着：“拖他到巡捕房去，给他点颜色看看！”

那些狗腿子又拉又推地把遍体鳞伤的童传根架进巡捕房。狗腿子同伪巡长叽叽咕咕地捣了一阵鬼。传根断断续续地听到“这个臭漆匠，竟敢打我们经理……这点小意思，……”传根这时才知道，他挥拳打的，是那家银行的经理。旧社会“有钱能使鬼推磨”。伪巡长受了贿赂，根本不管童传根已被殴打成伤，便无理判决童传根“动手打人，破坏社会秩序，罚金五元，关押半天，通知店方。”童传根据理力争，也是枉然。

五元钱哪里来呢？童传根被关押到傍晚，由巡捕押回店里。老板对巡捕点头哈腰，又是递烟，又是敬茶，拿出五元钱伪钞送过去。巡捕把眼睛一瞪说：“怎么？就这一点？”老板又连忙叫学徒去买了一条香烟，才把那巡捕打发走了。老板眼珠子骨碌一转：童传根现在是老师傅工钱了，还不如再收一个学徒合算。这不正是停他生意的好机会吗？转身见童传根躺在灶间里，便恶狠狠地停了他的生意。童传根怒火从胸中起，不顾满身疼痛站了起来，挺起胸膛，拖着受伤的身体，踉踉跄跄地走出了“仁新祥”漆店。

传根失业了。他每天一清早就到茶馆里等待着油漆店老

板来雇用，他一连等了十几天，也没有等到一天生意。他把家里能够变卖的都变卖了，怎样生活下去呢？他拿着曾经给了他多少美好憧憬的油漆刷子，感叹万分。为了掌握这把刷子，挨打受骂，熬过了吃不饱穿不暖的学徒生活，而今，算是有了手艺，却又没有出路。怨恨之下，他决然把那把油漆刷子丢进了破箱子里。

上海解放了！黑暗的岁月熬到了头，童传根才重新拿起刷子，在国营建筑公司里当上了油漆工。

吃过旧社会号称“富贵人生意”油漆行业苦的童传根，更深刻地体会到新社会“为人民服务”这油漆工的光荣和幸福。当他领到“工作证”，拿到固定工资的时候；当他头痛发热，享受着劳保医疗待遇的时候；当新到一个工地，领导同志总是谦虚地征求老师傅们的意见的时候；当工程结束，领导总是热情慰问，说着：“老师傅辛苦了”的时候；当回到家里，看到妻子、儿女都过着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的时候……，童传根对比旧社会，总是心情无比激动。一九五四年，童传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决心听毛主席的话，跟着党走，用自己的双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新贡献。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战鼓擂响了。童师傅参加洛阳拖拉机厂工程建设结束后回到上海，放弃假期，立即投入了闵行重型机器厂厂房建设工作。领导上派他担任油漆、玻璃中队的中队长。担子更重了，他的干劲也更足了。

工地上一片繁忙景象，人来车往，有条不紊；高空中，工人系着安全带，稳当地工作着。童传根看着看着，不禁想起了二十多年前的“字林西报馆”水落管工程，想起了油漆店面摔下来的悲惨遭遇……。那时候资本家只知道赚钱，而工人生活没

有保障，又没有安全措施。现在为社会主义工作，既安全又光荣，能不能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些呢？

“老童，在想什么呀？”工程大队党支部书记老王迎面跑来。

“想想过去，比比现在，真是两种社会两重天啊！一想到这里，我浑身都是劲哪！”童师傅回答说。

“对，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你想到现在怎么样？”

“我想，油漆粉刷和玻璃镶嵌工作，可以利用行车，向外绕上两块脚手板，再在外面横上两块，这不就变成了活动的脚手架了吗？这样，可以为国家节省一万六千多根毛竹和大量的人力。不知这样行不行？”童师傅谦虚地谈出了自己的设想。

“好啊！我完全支持。但这样做安全不安全？再听听其他同志的意见怎么样？”老王立即召开了诸葛亮会议。会上，工人们一致同意童师傅的建议，并且进一步补充了一些意见，使童师傅的设想更加完整，更加安全可靠。

当童师傅和他中队的同志们，粉刷完最后一堵墙壁后，厂房工程基本竣工了。童师傅看着那雄伟的厂房建筑，幸福的喜悦涌上心头。

“童师傅，公司来电话，要你明天到设计院去参加会议，一起商量闵行一条街建筑的墙粉采用什么颜色。”老王急匆匆地跑到工地上，又交给童师傅一个新的战斗任务。

“要我去参加会议？”童师傅怕自己听错，又进一步问清楚。

“是啊！怎么，想打退堂鼓？”老王笑咪咪地开着玩笑。

“不，不。我是说，叫我这个大老粗去，在工程师和技术人员面前讲些什么呢？”童师傅说。

“工人新村用什么墙粉好。就用你几十年的配料经验，讲讲看法嘛！”老王鼓励着他。

晚上，童师傅激动得睡不着觉。油漆色彩，是人们精神面貌形象的反映，闵行工人新村的色调应当用什么呢？一块一块的颜色板在童师傅的心里比较着、品评着。在那黑暗的旧社会，劳动人民的处境是灰色的，象块块乌云，压得劳动人民透不过气。如今解放了，翻了身的工人，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发挥着冲天的革命干劲。工人新村的墙粉应当用热色，对，用热色！

第二天，童师傅怀着革命激情，参加了设计院的会议。

“毛主席、共产党为工人造新村，是对翻身作主的工人阶级的关怀，体现了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无比优越性。我认为工人新村的墙粉颜色应当明朗、热情、大方。我建议用淡金黄色。”童师傅把自己设想的建议谈了出来。经过讨论，到会的同志们一致同意。

“什么时候开始刷呢？”领导同志征询童师傅的意见。

童师傅坚决地回答：“说干就干，明天就开始。”

童师傅带领工人们，迎着晨曦，投入了紧张的战斗。他上下来回地刷着，刷着，刷得那么专心致志，那么均匀和谐，他把对党、对社会主义、对工人阶级的深情厚意，全倾注到刷子中去了。

童师傅的刷子从吴泾第一台十二万五千瓩双水内冷发电机的厂房建筑，到南京九四二四工程、文化广场工程等等工地，在描绘社会主义的美丽图画中，都曾作出过贡献。当他被评为市的先进生产者，得到鼓励的时候，他却总是谦虚地说：“我为党、为人民做得很少，党给我的荣誉却很大。没有党和

毛主席，我这个在旧社会被官僚、资本家看不起的‘臭漆匠’，怎么会有今天！”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和锻炼，童师傅进一步懂得了，光有朴素的阶级感情还不行，必须努力学习，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觉悟，才能不迷失方向，为社会主义祖国增色添彩。

上海市第七建筑工程公司工会写作组整理

工人登攀新高峰

——上海市机械施工公司工人汤士杰的家史

朝霞映在巨大的上海体育馆工地上。高耸的塔吊伸展着钢铁的巨臂，电焊的弧光闪烁闪烁，劳动号子此起彼伏，到处充满了一派战斗景象。那三十多公尺高的比赛馆，巍巍屹立。圆形的屋面象一朵巨大的葵花，向阳怒放。

上海体育馆的屋面，面积达一万二千多平方米，高六米，重六百吨。它是由一万二千多根钢管焊接而成。在毛主席的“自力更生”、“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的方针指引下，上海建筑工人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大胆地采取了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网架地面拼装、整体提升、高空旋转就位的新技术。担任这次吊装总指挥的，就是四十九岁的起重工，共产党员汤士杰同志。

这位担任赶超世界先进水平项目的吊装总指挥，在旧社会却是一个受尽了欺凌的长工和“抢快”小工。解放后在党的教育和培养下，他才成为今天的吊装总指挥，为工人阶级长志气！

长工是不好欺的

汤士杰出生在崇明一个“抢快”小工的家庭。家里无田无

地。父亲汤贵林当“抢快”小工，终年飘流在外乡，从这个打桩工地流浪到那个打桩工地，勉强混一碗饭吃。阿妈为了减轻阿爸的负担，租了一部纺车和布机，整天又纺又织，织成的布换些玉米杂粮，养活年迈的祖母和幼小的士杰。

士杰十五岁那年，崇明早灾闹饥荒。打短工没人家要，阿妈织了布也卖不出去，逼得士杰只能到一个姓张的地主家去当长工，从此过着起早落黑、忍饥挨饿的奴隶生活。

一个盛夏的上午，士杰刚挑完水，地主又叫他备车，送地主婆到十里开外的一个亲戚家里去作客。一路上头顶太阳晒，脚下热气烘，士杰露着身赤着脚，使劲地捏住独轮小车的车把，在滚烫的泥沙路上“吱呀吱呀”地行走。坐在车上的胖地主婆撑着黑绸伞，摇着鹅毛扇，还一个劲地叫热；车轮碰到小石子，车子稍微颠簸一下，她又骂骂咧咧的没个完。

士杰忍着气，好不容易把胖地主婆送到了亲戚家。这是地主婆女儿的婆家，也是个地主。见车子来了，忙把胖地主婆扶到屋里，叫丫头捶背、打扇、送茶、递毛巾。接着又招待地主婆吃午饭，鸡鸭肉蛋，摆了一桌子，夹菜劝饭，闹个不休。而汤士杰却饿着肚子，无人理睬。

一直到地主们吃完饭，挺着肚皮剔牙缝的时候，地主婆的女儿才指指一个小间，对士杰说：“到那里去吃。”士杰走进去一看，桌子上放着一碗盖些臭咸菜的粗米饭，而边上还有一只猫饭碗，两只大花猫正爬在那里争食吃。原来这是猫食间！士杰顿时气得怒火直冒：“狗地主婆把长工当牲畜看待，我人穷志不短！”想到这里，他丢下地主婆，转身跨出大门，强忍饥饿和酷热，一个人走回自己家里。

傍晚，士杰刚走进地主家的大门，地主就瞪着两只贼眼破

口大骂：“胆大包天，竟敢作弄起人来了……”

士杰一听，知道是为白天推车丢下地主婆的事，便理直气壮地顶了一句：“为什么把我们穷人不当人看待！”

“嘴还硬！看我不打死你这个……”地主抓起放在门角里的门闩，劈头就向士杰掷过来。门闩打在士杰的脚上，他忍住痛，眼看又一门闩向自己头上打来，他再也忍不住了，愤怒地说：“我们长工也不是好欺的！”就势一躲，顺手把门闩抢过来，狠狠地朝地主丢去，正好打在地主身上。士杰出了口气，便扭头走了。

天下乌鸦一般黑，哪个财主不喝穷人的血？无论是在这个地主家，还是在那个地主家，士杰都是累断筋骨，受尽了气。汤士杰苦撑苦熬，到了二十一岁，那时正是一九四六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到处抓夫抽丁当炮灰。张地主的儿子因新近当上了伪保长，于是又一场灾难临到了汤士杰头上。一天晚上，一阵狗叫，随即“砰！砰！”的几下枪声，划破了沉寂的夜空。“抓壮丁！”村子里顿时乱了起来，哭声、喊声闹成一团。士杰把油灯吹灭，拿起一把菜刀，翻身跳出后窗，摸黑奔向野外，躲进了芦苇丛里。

拂晓，士杰想在家里呆不住了，和妈妈商量，还是到在宜兴打桩的父亲那里找个工作做为好。于是，当天告别了妈妈，到宜兴去找父亲。

团结起来斗倒老板

汤士杰在宜兴码头的工地上，找来找去，始终没有见到父亲。正当他感到失望时，碰到了父亲的同行洪师傅。在这位

洪师傅的帮助下,士杰开始做“抢快”小工。

一天,士杰和工友们刚上工,一会儿,天上乌云滚滚,一场暴风雨来了。在这寒风冷雨中,老板躲在避雨处,硬逼着工人们加固钢丝绳。士杰衣裤湿透了,浑身打抖,冻僵的双手拉着钢丝绳。忽然,一阵狂风裹着豆粒大的雨点,刮得士杰睁不开眼睛,只觉得小手指给什么东西压了一下,一阵钻心的疼痛。他睁眼一看,左手小指头已给钢丝绳轧断了。洪师傅赶忙从自己穿的短衫上撕下一块布条给他包上。寒风在怒号,冷雨在猛下,伤口的血渗透布条,和着雨水往下滴,士杰忍着刀绞般的痛苦继续干着,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滚下来……就这样,士杰熬苦熬累地干了一年。

一九四七年冬天,士杰跟随桩架来到马鞍山打桩。

大年三十,大雪纷飞,漫天皆白。这一天照理应当“封关”,让大家歇一歇了。老板却说:“工程马上可以完工,大家今天做完了再歇,一天发三天的工钱。”士杰和工友们冒雪打桩,衣服被打湿了,手被冻裂了,直到晚上,才把工程做结束。可是,当大家又冷又累地到帐房去结帐时,却仍旧只拿到一天的工资。工友们问帐房:“老板不是说一天发三天的工资吗?”帐房只是摇头:“不知道,没有听说过。”工友们到处寻找老板,却连个人影也不见。原来,贪得无厌的老板,骗工人们上当以后,装满了从工人身上搜刮来的脂膏,溜回上海过年去了。士杰和工友们个个气得直咬牙。

不久,士杰得到家里的来信,知道父亲已经回上海,便告别了洪师傅和工友们,回到了上海。

这时,一个小包工头约他们到南京去打桩,讲定每人每月一担米钱。为了养家活口,父子俩只得答应了。

一九四八年的冬天特别冷。士杰和父亲冒着零下十几度的严寒，在十几米高的桩架上攀上爬下。可是到了月头上发工钱的时候，老板把双手一摊说：“难啊！这两天银根紧。这个月的工钱嘛，下次一起发吧！”说着，夹着皮包乘火车回上海了。

第二个月、第三个月……直到第五个月，工钱还是不发。工友们去催帐房，帐房每次总是说：“等老板一回来就发。”工友们再也等不住了，家里大儿小女都张着嘴巴等饭吃，怎么能够三五个月分文不给！大家立刻派了代表赶到上海，寻找老板。原来，老板用克扣工人的血汗，在交易所里搞买进卖出，大做投机生意。

直到第六个月，工程结束，工人才领到了工钱。可是，黑心的老板，却仍旧按半年以前的米价折算。工人们愤怒无比，一下子把老板围了起来，要他按照当时的米价计算工钱。汤士杰对工友们说：“我们团结起来斗倒老板！”

老板却把脸一沉，蛮横地说：“不行！你们是半年前头派来的，就得按半年前的米价算。”

“哪有这种横理！”工人们顿时哄了起来。

一个工人愤怒地说：“半年前的工钱，你半年前就应当发。拖了半年，一担米钱现在买不到几斤米了，你存心想逼死我们工人吗？”

“半年里头的工钱，你都囤积货物堆在栈房里，赚足钞票了。你现在按半年前的米价发，这不是明着吸我们工人的血吗？”另一个工人点穿了他的阴谋。

在工人们理直气壮的指责下，老板的脸红一阵白一阵，最后他要起流氓手段来了：“工钱就是这么算！你们要就拿，不拿就算数。南京，上海，随你们到哪里去告好了！”说着，就在

狗腿子们的保护下，溜走了。

工地上谁不知道，老板是依靠战犯汤恩伯的势力发家的。无论是南京还是上海的衙门里，都有他的点头“兄弟”。告也罢，不告也罢，都是一个样。大批工人的血汗，已经变成了美钞、金条，进了老板的腰包。

就这样，汤士杰和父亲两个人所得的工钿，连买两张从南京回上海的火车票都不够，只得卖掉几件衣服，才勉强回到上海。

这时，解放大军的隆隆炮声夹着春雷，从北方传来。这隆隆炮声，在那漫漫的黑夜，如一道闪电照亮了穷人的心房；这隆隆炮声在那受欺受难的年月，如一声炸雷激起了穷人的希望。士杰望着狼狈逃窜的国民党匪军和老板们，他感到穷人翻身的日子快到了！

干社会主义就有用不完的劲

一九四九年五月，春雷一声震天响，劈开乌云见太阳。上海解放了。

汤士杰回到阔别三年的崇明家乡，和父母亲、妻子一起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斗倒了地主，分得了土地和房屋。

一九五四年，汤士杰进了国营机具站。解放前的木桩架换成了铁桩架，从自由落锤发展到用汽锤，并且装配了塔式吊车、履带吊车，国家为工人们提供了优异的工作条件、设备。汤士杰看到这一切，心情激动不已。解放前为资本家打桩，打进土里的是“抢快”小工的血和泪，桩打得越多，工人身受的剥削

和压迫越重。如今为新中国打桩，多打一根桩，就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多打一分基础，桩打得越多，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也越巩固。汤士杰以国家主人翁的姿态，和同志们一起出大力，流大汗，转战在一个又一个的建设工地上。

一九五八年，机具站改成了机械施工公司。原来的“抢快”工，分成了打桩和起重两个工种，汤士杰担任了起重工分队长。九月，领导上交给汤士杰和他的分队一个艰巨的任务：要在十七天里，安装好上钢厂的一个转炉车间，在国庆节出第一炉争气钢，向党和毛主席献礼。

要在短短的十七天里，安装好这么一座炼钢车间，这在解放以前是不可设想的。大跃进的战鼓激励着同志们，汤士杰二话没说，便带领分队的同志们，斗志昂扬地奔赴战场。

全分队的同志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争分夺秒，争取提前完成任务。为了加快进度，全队分成二班，一班下工，另一班顶上去，大家从不计较工作时间。在那最紧张的日子里，汤士杰突然病了，发着高烧。领导和同志们硬把他关在屋子里，命令他休息。可当大家一走，他又出现在工地上了，笑着说：“小病无所谓，干社会主义就有用不完的劲！”说完，又吹起哨子，指挥吊车干起来了。

工人们苦干加巧干，没等到第十七天，汤士杰和分队的同志们就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九月三十日的深夜，天气突然变化，狂风刮得人们睁不开眼，暴雨倾盆而下。

汤士杰正睡在床上。他想到刚吊装好的屋面钢架，还没有来得及焊接好缝道，如果雨漏进炼钢炉，将会发生爆炸事故。想到这里，他一跃而起，拿起油布就叫喊分队的同志们：

“同志们，快去盖屋面啊！”汤士杰带头冲进暴雨里。

全分队的同志们顶风冒雨，爬上十六米高的转炉车间屋面，紧张地盖了起来。狂风卷着大雨，简直要把人连同油布一起吹走。汤士杰就和大家用保险带把身子扎在屋顶钢架上，继续干。他和同志们一心只想保护国家财产，相互鼓励，相互帮助，坚持战斗。雨声里夹着笑声，汗水里渗和着雨水，他们从晚上九时一直战斗到凌晨三时，终于制服了狂风暴雨，完成了抢救任务。

雨过天晴。当太阳从东方升起，出钢的钟声响了。一炉红彤彤的钢水，迎着国庆节日的朝阳，飞溅出朵朵金花。汤士杰和分队的同志们，望着这炉争气钢，笑了。他们是笑得那么欢快，那么自豪。

汤士杰同志生产上是闯将，学习上也是积极分子，他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革命理论，通过不断学习，进一步明白了许多革命的道理。他懂得了：解放以前自己受地主的迫害，遭老板的欺凌，到处受气、受压迫，那是因为政权掌握在地主、资本家手里。只有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夺取了全国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工人阶级才能当家作主人。他懂得了：革命胜利后，一小撮阶级敌人是不死心的，一遇风吹草动，就蠢蠢欲动，梦想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只有不断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保卫红色江山。

一九五九年九月，汤士杰同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下定决心，要一辈子跟着毛主席干革命，为翻身的工人阶级争气，为毛主席争光。

在大跃进的火红年代里，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汤士杰同志胜利地经历了一场又一场严峻考验。在一系列的社会主

义大型企业建设中，汤士杰指挥了一个又一个吊装战斗，每一次战斗的胜利，都给他带来了前进的动力。

一九六四年，汤士杰到过加纳，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九六七年，他又到过坦桑尼亚。他为支援非洲人民建立民族经济，共同反对新老殖民主义而战斗。

中国工人阶级有志气

一九七二年一月的一天，公司领导同志把汤士杰找了去，交给他一项紧急任务：把从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进口的几台十几吨重的精密仪器，从飞机上卸下来，并进行安装。这个资本主义国家提出：卸装时不准有丝毫碰撞，因此需要一部十五吨的铲车，并要求在四小时内工作完毕，否则既要影响合同的完成，还要罚款。

领导同志恳切地说：“这一批精密仪器，是打破帝国主义禁运的结果，是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胜利。但那个资本主义国家刁难我们，提出苛刻的卸装要求。因此，完成这次卸装任务，不仅是一项经济工作，而且是一场政治斗争。目前的困难是，我们对仪器的形状、体积都不清楚；十五吨的铲车我们手头也没有，到外单位去借，时间又不允许。你们看怎么办？”

“这刁难难不倒我们中国工人！”汤士杰激昂地说，“我们保证按质按时地完成卸装任务。至于用不用十五吨的铲车，那是我们的事，他们没有理由作硬性规定。我们手头没有十五吨大铲车，就想别的办法。让帝国主义知道，我们中国工人阶级是有志气的！”

“好！相信我们工人同志一定能够克服困难，打好这次政

治仗。”领导同志鼓励说。

是的，这是一场贯彻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政治仗，只能打好，不准失败。他接受任务后，立刻和参加这次战斗的同志们一起，奔赴机场。

因为仪器的体积、形状等情况不明，这给完成任务增添了困难。在困难面前，汤士杰和同志们斗志昂扬，你一言我一语，群策群力，集思广益，迅速制定了一套“洋”方案，一套“土”方案，一套应急备用方案。

汤士杰和同志们一起扛道木，搬钢管，紧张地做准备工作。

隆冬的西北风在市郊上空刮得“呼呼”响，傍晚又下起雪来，机场上白皑皑的一片。六点，七点，八点，飞机还没有来。汤士杰和同志们沉着地守候在机场，一直等到十点钟，飞机才带着呼啸声降落在机场跑道上。

飞机一落地，汤士杰和同志们就登上机舱，摸清情况。原来，仪器包装箱有一人多高，十多米长，十几吨重。听那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押运人员讲，他们是用十五吨的铲车，从飞机的后门硬装进去的。汤士杰一看，仪器和机舱之间的空隙不超过五厘米，连一根钢管也塞不进去。这真好比南瓜长在瓮头里——难拿。在复杂的情况面前，汤士杰异常镇静，显然，原来设想的几套方案都不行了，但他知道，上海一千万人民在期望着，上海工人阶级就在他身旁。群众的智慧一定能够战胜困难，革命的意志一定能够消冰化雪。汤士杰和战友们根据现实的情况，立即召开了诸葛亮会，制订了一个新的土洋结合的卸装方案。

战斗打响了。同志们顶风冒雪，扛着道木，穿梭来回；汤士杰坚定沉着地吹着哨子，指挥平板车、吊车就位……

雪更大了，风更猛了。深夜十一点钟的气候，滴水成冰。

汤士杰和同志们的棉袄棉裤从头到脚都被打湿了，但没有一个同志喊冷，皱一下眉头。他们知道：这是一场和帝国主义争时间、比意志的政治斗争！

一切准备就绪，汤士杰一声哨音，卷扬机隆隆地响起来，工作台在移动了，逐渐地从飞机后门中露出精密仪器。

一会儿，这台大型精密仪器已经完整无损地装上了平板车，运到了指定的地点。随着仪器在指定地点安全就位，汤士杰和同志们抹去脸上的汗珠和安全帽上的雪花，时钟正敲一点钟。第一次战斗胜利，只花了三个小时。

就这样，第二次、第三次，在汤士杰的指挥下，在工人同志们的集体智慧面前，困难就象纸老虎那样，一次又一次地被攻破了。卸仪器设备的时间一次比一次短，最后一次仅用了一个多小时。那个资本主义国家的随机押运人员也不得不翘起大拇指说：“效果很好！”一次战斗的胜利，它只是预示着另一次战斗的开始。

敢挑重担攀高峰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一九七三年的春天，在一片胜利的捷报声中来到了。

汤士杰正在五·七干校学习班学习，接到支部书记老夏的一个电话：“学习班一结束就回来，我们接到了上海体育馆工程的任务。”听说要参加万体馆工程，汤士杰再也抑制不住热切投入战斗的心情，就在学习班结束的当天晚上，他就背起书包，连夜赶回自己的战斗集体。

深夜，办公室的灯光还亮着。当汤士杰推开门，只见老夏

和同志们正聚精会神地在图纸旁讨论着什么。

“我知道你一接到电话准坐不住了，快休息去吧，明天我们再好好地谈谈。”老夏一面说，一面帮汤士杰拎铺盖。

“不！先谈谈工程的情况吧，不谈工作，我这个觉是睡不着的。”

“嘿！你啊……”老夏知道汤士杰的脾气，只得一块儿坐下来。

“上海体育馆是个现代化工程，这一次我们承担了这个工程的全部吊装任务，其中最关键的是吊装比赛馆的屋面问题。”老夏点燃了一支烟接着说：“你看，这就是屋面图纸。它的直径为一百二十四点六米，复盖面积为一万二千二百五十二平方米，高六米，相当于两层楼高；自重约六百吨，相当于一百五十辆四吨卡车的载重量。这么一个大家伙，用什么办法安装到空中去呢？”

老夏让汤士杰看完图纸以后，继续说：“目前，大家讨论中提出的吊装方案有三种，意见还没有统一。一部分同志认为高空散装比较保险，并且有资料可循，操作也有经验。另一部分同志提出采用顶升的方法。大多数同志认为地面拼装、整体提升的方案比较好，但这是一项新技术，缺乏经验。上级领导同志鼓励我们：比赛馆屋面网架的安装，尽量采用新技术，为建筑安装工业闯出一条路子来。我是赞成整体提升的方案的，但困难的确很大，很多地方都是无法可循，所以直到现在还没有决定。”老夏要汤士杰依靠集体智慧，打好这一仗。

一连几天，汤士杰和吊车司机小张、小李等青年谈了好几次，又和老赵、老王等几个师傅一遍一遍地商量。同志们的意见，深深地印在汤士杰的脑海里，鼓舞着他为工人阶级争光的

顽强决心。

讨论比赛馆屋面网架的施工会议召开了。汤士杰不慌不忙地站起来，会议室里寂静无声，大家都想听听这位经验丰富的起重老师傅的意见。

“我对体育馆比赛馆屋面网架吊装的施工方案提一点意见。散装的方案是比较保险，我们也有经验，但是要把一根根钢管吊到空中，在高空焊接拼镶，质量得不到保证，又容易出事故，工期也比较慢，这不符合多快好省的原则。采用整体顶升的方案，需要国家拨给我们一整套全新的设备，当前又不可能。而采用整体吊装的方案，就能解决这些问题，质量好，工期快，符合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精神。我在学习班回来后，和老师傅们商量了，大家干劲冲天，大伙儿说：国内外缺乏这种施工方案的资料，我们就自己闯！我们有党和人民的支持，有工人阶级的集体智慧，我们敢挑重担攀高峰！为祖国的建筑业闯新路，这是我们工人阶级的责任！”

汤士杰说出了广大起重工人的心里话，引起了同志们的热烈讨论。许多同志都表示坚决支持，会议很快就取得一致意见，同意采用整体吊装的方案，并经过深入、仔细的讨论，补充了不少意见，制订了网架地面拼镶、整体提升、高空旋转就位的完整方案。经过领导部门的批准，这方案便决定了下来。在党组织和同志们的推荐下，上海体育馆工程指挥部任命汤士杰同志为吊装总指挥。

领导同志紧握着汤士杰的手，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现在盖的新体育馆，政治意义很大！解放前，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装装场面，请了中外专家设计，用建筑工人的血汗盖了座江湾体育馆，屋面的面积只有三千七百平方公尺，而且偷工减料，没

有几年就破烂不堪。解放后政府拨款修建，才成为现在这个样子。如今，党和国家建造的上海体育馆，规模要比江湾体育馆大好几倍，设备、质量也好过不知多少，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功伟绩。党相信你一定能够依靠群众，完成任务，为国争光！”

党的信任，阶级的委托，使汤士杰激动万分，热泪盈眶。一个在旧社会到处受气的“抢快”小工，解放后，在党的培养教育下，要挑起这么重的革命担子，要为工人阶级争气，心里怎么能不激动呢！

六月骄阳红似火，工地上朝气蓬勃，洋溢着青春的活力。搅拌机在轰隆隆地不停歌唱，起重机伸展着钢铁的臂膀，混凝土翻斗车在来回奔驰，榔头泥刀在上下飞舞。夜晚，整个工地上焊花朵朵，分外绚丽灿烂。为了尽快地夺取整体吊装的胜利，土建工人革命加拚命，高速度地浇捣大型混凝土预制柱头。安装工人苦干加巧干，日以继夜地拼镶屋面网架。他们满怀信心、斗志昂扬地战斗，送走了一个个繁星闪烁的夜晚，迎来了一个个红霞满天的早晨。

可是，屋面网架整体提升、高空旋转就位的新工艺绝不是一帆风顺就能够做到的。它的附属工程和准备工作要求都非常高。它要求三十米高的大型混凝土预制柱头安装垂直偏差不超过二厘米；它要求网架的吊点十分准确；它要求又大又重的屋面网架在提升过程中，垂直误差只能在三公分之内；它要求高空旋转就位时保持平衡……总之，要把小山一般的屋面网架吊上高空安装，困难是巨大的。但汤士杰紧紧地和广大工人群众、技术人员团结在一起，拧成一股绳，在外单位有关工厂、科研、设计单位、大专院校的大力协助下，短短的两个

月,就用集体的智慧攻破了一道道技术难关,用只争朝夕的精神克服了一个个困难,胜利地安装好了混凝土柱子,拼镶完屋面网架;竖起了一根根五十多米高的大巴杆,串好了一万多米长的钢丝绳……附属工程和准备工作都已完毕。

试吊的那天上午,汤士杰又攀上爬下,从头到尾地把机器、巴杆、钢丝绳、葫芦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一切都符合要求,可以试吊了。

卷扬机隆隆地响起来,屋面网架渐渐上升。自整角器的指针准确地反映出上升的高度:一厘米,二厘米,十厘米,二十厘米,一百厘米,一百五十厘米。“情况正常,停止试吊!”

这时,现场上每一个人的心里都乐滋滋的,艰苦奋战了三个月,现在胜利在望了。有几个青年工人甚至高兴得跳起来,高喊着“成功了!”“成功了!”

谁也没有想到,就在把屋面网架放下来的时候,只听见“咔! 咔!”的几声,葫芦不转了,钢丝绳不动了,卷扬机任你怎么放松,屋面网架就是不动。

在这关键时刻,汤士杰紧紧依靠党的领导,依靠群众。他冷静地和领导、老师傅们交换了意见以后,就采取了措施:马上开诸葛亮会议,请大家讨论,寻找试吊失败的原因。

网架整体提升碰到新困难,从阴暗角落里就刮出了一股冷风。什么“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呀,什么“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呀……。但是,冷言冷语和讽刺,丝毫动摇不了汤士杰和广大工人群众的坚定信念,只能激发起他们更大的革命干劲。

在党组织领导下,发动了所有的工人、技术人员进行讨论,大家认为原因可能有两个:一个是葫芦出毛病;二是钢丝绳上的问题。葫芦拆下来了,经过检查,没有毛病。钢丝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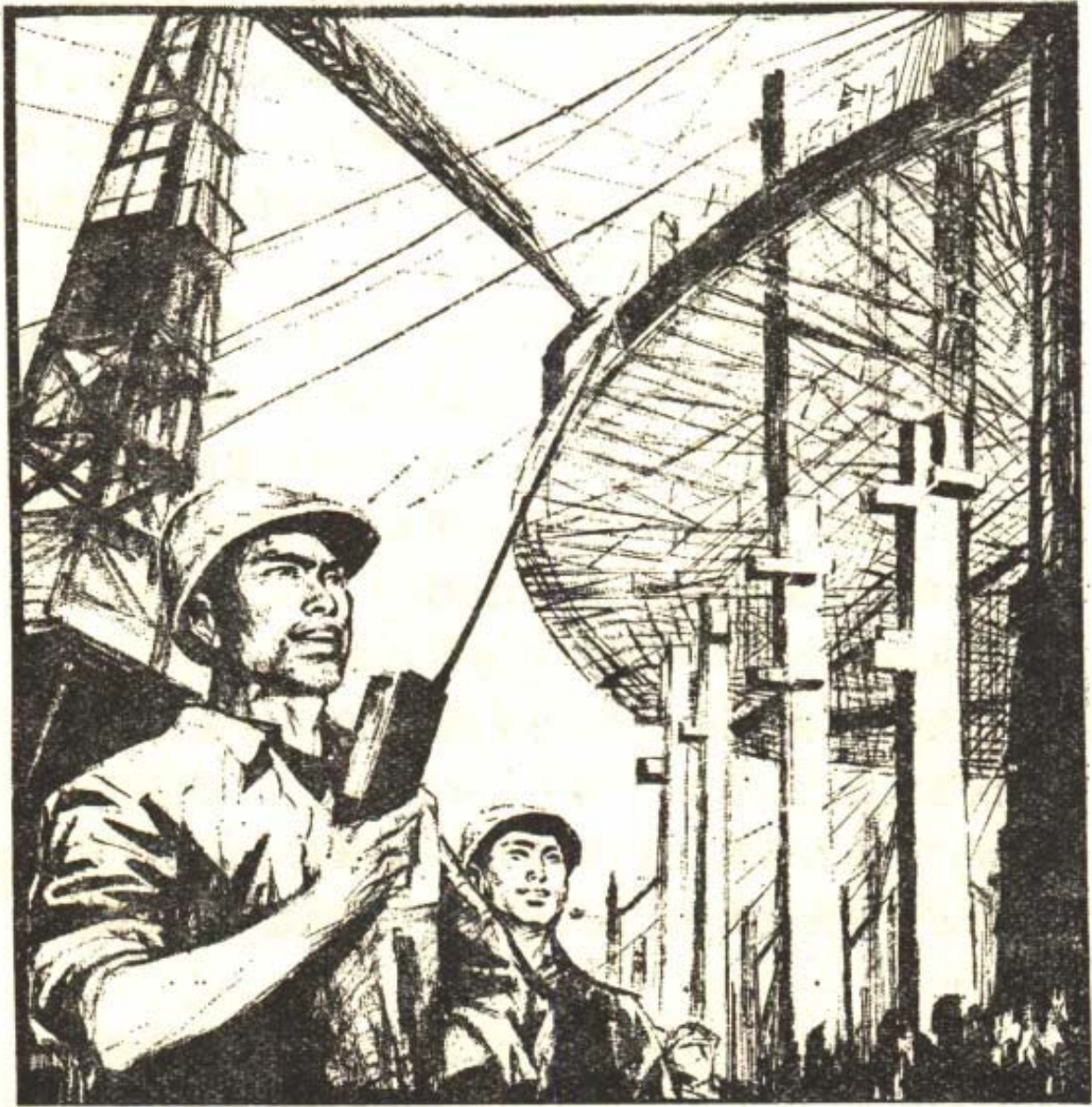
检查过了,完好无损。网架放不下来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高空旋转就位就不能进行,整体吊装的方案也要归于失败,并且三个月来的一切准备工作,人力、物质设备就会全部白白地浪费,而且还要耽误整个工程的施工进度。汤士杰和老夏、赵师傅、王师傅以及同志们捉摸来捉摸去,排除了一个又一个的原因,最后,只剩下钢丝绳的串法这个问题了。而目前这种钢丝绳串法,几十年的实践证明它是对的,书本上也说它是科学的,怎么会错呢?

晚上十点多了,集体宿舍里的电灯一盏盏熄灭了,为了明天的战斗,汤士杰却怎么也睡不着:“我决不能辜负党的期望和工人阶级的委托!”想到这里,他扭亮电灯,拿起床头上的毛主席著作,认真地学习起来。读着读着,汤士杰的眼睛发亮了。

毛主席教导说:“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

“是啊,前辈起重工人们使用的钢丝绳串法,适用于起吊一般的重量和面积,如今这么大这么重的屋面网架,是过去从来没有吊装过的,再用一般的钢丝绳串法去解决新问题,怎么会不出故障呢?……对,问题就在这里!思想上的因循守旧,才造成了钢丝绳串法的问题。”汤士杰想着想着,心里亮堂了。

第二天,汤士杰和同志们一起重新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批判了因循守旧、保守落后的错误思想,大家的认识提高了,方向更明确了。同志们一致同意老汤的分析。为了检验这个分析是否符合实际,汤士杰和老赵等七、八个老师傅说干就干,决心在实践中寻找失败的原因,创造新的方法。



他们拿来了木葫芦、麻绳和一桶桶石子，用木葫芦代替铁葫芦，用麻绳代替钢丝绳，用几桶石子代替屋面网架，按照屋面网架的重量、面积的比例进行试验。果然，在起吊下放时碰到了同样的问题，证明汤士杰的分析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于是大家索性丢开老的钢丝绳串法，你串我串，一次次探索，一次次试验。最后，一种崭新的、适用的钢丝绳串法终于诞生了。经过工程指挥部的批准，在汤士杰的指挥下，一万多公尺长的钢丝绳迅速地重新串好了。这时，每一个同志的心里，都在盼望着正式起吊的这一天到来。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一九七三年十月十九日，晴空万里，金风送爽。比赛馆工地上，高耸入云的大塔吊，悬挂着鲜艳夺目的红布巨幅标语：“工人阶级志气高，定叫网架冲云霄！”三十六根三十米高的混凝土柱子和六根五十米高的巨型巴杆上，鲜红的战旗迎风飘扬。在它们的脚下，小山般的屋面网架打扮得五彩缤纷，在朝阳照耀下，分外妖娆。

今天，上海体育馆比赛馆的屋面网架就要正式吊装了，这是中国建筑史上的创举！上海工人阶级，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信心百倍地去攀登建筑工业技术的新高峰！

上午八时半，近万名工农兵代表从全市四面八方涌向上海体育馆工地，还有各方面的领导同志也出席观看。起吊的时刻将要到了，一队队雄赳赳的起重、安装工人，各自奔赴自己的战斗岗位。现场上一下子静了下来，只听见风吹红旗哗哗响，人们不约而同地凝视着指挥台……

汤士杰带着党的信任，阶级的委托，昂首挺胸，大踏步地

走上总指挥台。此刻，他的心情和前来观看的上万名工农兵代表的心情一样沸腾。他明白：巨大的比赛馆屋面网架整体吊装，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是坚持毛主席的“自力更生”、“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的方针的产物。他知道：起重工肩负着党的信任、工人阶级的委托，肩负着赶超世界先进水平、长中国工人阶级志气的重任。汤士杰迎着东方红日，庄严地下了起吊令。

“开始提升！”

随着哨声长鸣，十多台大型卷扬机雷鸣般地响起来，平卧在地上的屋面网架渐渐地升高，升高。十公尺、二十公尺，突然人群中传出一阵惊呼，第九根柱子上的“牛腿”眼看要和正在上升的网架相碰了，可是卷扬机还在轰隆隆地响，屋面网架仍在升高。有些人担心地走到工作人员身边低声地询问，可工作人员却乐观地微笑着回答：“不要紧，不会碰到的。”果然，网架的钢管和柱子的“牛腿”擦肩而过，安然无恙。

这时，网架已上升到三十五米的高空，卷扬机稍停之后，在总指挥的命令下，又震耳欲聋地响起来，网架开始高空旋转就位了。上万名工农兵代表，怀着热切的心情，观看这个自重六百多吨重的屋面网架，在高空慢慢地移动、移动，它是多么听指挥啊。一会儿，它就已经安安稳稳地被安装在三十公尺高的柱子上，开始了自己的职守。全部吊装时间仅用了二小时二十四分钟。

“成功了！”“成功了！”

汤士杰看着工地上欢腾跳跃的阶级兄弟，双眼湿润了。

汤士杰啊！在旧社会，你是地主的长工、老板的奴隶，多少次难忍的欺凌，你要反抗！你要争气！但是，那时政权在反

动阶级手里，尽管你有多大的本领，也只能是离乡背井，到处受气。如今，党和毛主席解放了你，毛泽东思想哺育着你，你要为工人阶级争气，为社会主义祖国争光！

汤士杰紧紧地握着前来祝贺胜利的同志们的手，激动地说：“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是党的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工人阶级集体智慧的产物，是全市有关工厂、科研单位共产主义大协作的胜利凯歌。我们还做得很不够，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是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工人阶级将怀着对旧社会的深仇大恨，对社会主义祖国的无限热爱，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当然还有许多战斗在后头，还要努力作战”的教导，奋发图强，走中国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去攀登世界先进水平的一个又一个高峰。

上海市机械施工公司工会写作组整理

【作者】上海市建筑工程局工会选编

【形态项】 112;19cm

【出版项】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ISBN号】 I252.4

【原书定价】 ¥0.22

【参考文献格式】上海市建筑工程局工会选编. 幢幢“洋楼”有血泪. 上海市建筑工人家史选.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